

分类号：C93
密 级：公开

学校代码：10363
学 号：2221110216



安徽工程大学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题 目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
评价及政府干预策略研究

论 文 作 者	<u>胡汉斌</u>
校 内 导 师	<u>汪茂泰</u>
校 外 导 师	<u>毛月霞</u>
专业学位类别	<u>公共管理</u>
研究方向（领域）	<u>地方政府治理</u>

论文提交日期：2025 年 5 月 13 日

分类号：C93
密 级：公开

单位代码：10363
学 号：2221110216

题 目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及政府干预策略研究

英文并列

题 目 **IMPACT ASSESSMENT AND GOVERNMENT
STRATEGIES FOR RURAL SPECIALTY
INDUSTRIES IN D COUNTY**

学生姓名：	胡汉斌
校内导师：	汪茂泰
校外导师：	毛月霞
专 业：	公共管理
研究方向：	地方政府治理
论文答辩日期：	2025年5月10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恪守学术道德，崇尚严谨学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明确注明和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及成果的内容。论文为本人亲自撰写，我对所写的内容负责，并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胡汉斌

日期：2025 年 5 月 13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本人授权安徽工程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 ☐，在 ____ 年解密后适用本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胡斌斌

指导教师签名：陈永泰

日期：2025 年 5 月 13 日

日期：2025 年 5 月 13 日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及政府干预策略研究

摘 要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与首要目标,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发挥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路径,对达成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愿景意义重大。对于 D 县而言,充分发挥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是推动其经济提升、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环境改善,促进乡村全面发展的核心举措,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以有效政府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为支撑,运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研法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分析法,选取农业强县 D 县作为研究区域。首先,着重归纳了 D 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成效。其次,围绕经济提升、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环境改善等维度,构建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2018—2022 年的数据,借助熵值法对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展开测度,并深入剖析影响该效应发挥的因素。最后,从政府干预视角针对性地提出促进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的对策建议。

研究表明:其一,从现实条件看,D 县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与经济基础,在粮油、水产、果蔬、畜禽、农文旅融合、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领域,不仅产业自身发展良好,且在带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增强

产业集群效应、培育经营主体、赋能乡村振兴等方面成效显著。其二，通过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测度可知，2018—2022 年期间，D 县整体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呈持续上升态势，历经从低质量水平逐步向中低、中高直至高质量水平的转变。其三，分指标评价表明，D 县乡村特色产业在经济提升、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环境改善等方面均发挥了带动作用，其中对文化繁荣的带动效应最为突出，对经济提升和社会进步的带动效应次之，对环境改善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经分析，产业扶持政策制定与落实不到位、特色产业融合程度低、人才资源匮乏、产业特色不鲜明、品牌建设力度不足，是制约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的主要因素。基于研究成果，本文从优化政策工具、深化三产融合、重构人力资本、升级产业特色、重塑品牌价值等维度提出对策，助力 D 县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提升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

关键词：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政府作用，评价体系

IMPACT ASSESSMENT AND GOVERNMENT STRATEGIES FOR RURAL SPECIALTY INDUSTRIES IN D COUNTY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plicitly proposed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n agricultural powerhouse, vigorously developing rural specialty industries, broadening channels for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wealth, and enhancing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As industrial prosperity serves as the cornerstone and primary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driving effects of rural specialty industries constitute a crucial pathway to achieving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holding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realizing the vision of "strong agriculture,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prosperous farmer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For D County, fully leveraging the driving effects of rural specialty industries represents a core initiative to promote economic advancement, social progress, cultural prosperity,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comprehensive rural development, thereby endowing this study with substantial practical relevance.

Supported by theories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is research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combined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analysis, with D County — a leading agricultural county — as the study area. First, the current status and achievements of D County's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Secon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constructed to assess the driving effects of these industries acros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progress,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Using data from 2018 to 2022, the entropy method is applied to measure the driving effects and analyze influencing factors. Finally,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enhance these effects.

Key findings include: First, D County demonstrates solid foundations with it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economic base, showing notable achievements in industries including grain and oil, aquacultu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livestock, agro-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These industries have effectively driven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engthened industrial clustering effects, cultivated new business entities, and empowered rural revitalization. Second, measurement results reveal a continuous upward trajectory in the driving effects from 2018 to 2022, progressing from low to medium-low, then to medium-high, and ultimately high-quality levels. Third, dimensiona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while the industries positively influence all aspects, their impact on cultural prosperity is most pronounced, followed by economic and social dimensions, with relatively weaker effects o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Critical constraints identified include inadequate industrial support policies, low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alent shortages, indistinct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sufficient brand-building efforts. Accordingly, this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encompassing policy optimization, tertiary industry integration, human capital restructuring,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 upgrading, and br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to help D County maximize governmental roles in enhancing rural specialty industries' driving effects.

KEYWORDS: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driving effects, government role, evaluation system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3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3
1.2.1 国外研究现状	3
1.2.2 国内研究现状	5
1.2.3 文献评述	8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8
1.3.1 研究思路	8
1.3.2 研究内容	10
1.4 研究方法	10
1.4.1 文献研究法	10
1.4.2 实地调研法	11
1.4.3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分析法	11
1.5 创新点	11
第 2 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13
2.1 概念界定	13
2.1.1 乡村产业	13
2.1.2 特色产业	13
2.1.3 乡村特色产业	14
2.1.4 带动效应	15
2.2 理论基础	15
2.2.1 有效政府理论	15
2.2.2 协同治理理论	16
第 3 章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概况	19

3.1 D 县基本情况	19
3.2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历程	19
3.3 D 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成效	20
3.3.1 D 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21
3.3.2 D 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成效	22
第 4 章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	25
4.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5
4.1.1 评价指标体系功能	25
4.1.2 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25
4.1.3 评价指标构建依据	26
4.1.4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27
4.1.5 分指标解释	28
4.2 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4.2.1 测度方法选择	31
4.2.2 数据来源	32
4.3 测度结果及评价标准	32
4.3.1 测度结果	32
4.3.2 评价标准	35
4.4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测算结果分析	35
4.4.1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的整体评价	35
4.4.2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分指标评价	37
第 5 章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影响因素分析	42
5.1 产业扶持政策：制度供给与政策效能的双重制约	42
5.2 产业融合：价值链延伸与业态创新的现实瓶颈	43
5.3 人才资源：传导性衰减与技能弹性缺失	45
5.4 产业特色：差异化竞争与同质化陷阱	46
5.5 品牌建设：认知断层与溢价流失	47
第 6 章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政府干预策略	49
6.1 政策工具优化：建立精准化政策效能提升机制	49

6.2 三产融合深化：构建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体系	50
6.3 人力资本重构：构建“金字塔式”人才支撑体系	51
6.4 产业特色升级：塑造不可复制的竞争优势	52
6.5 品牌价值重塑：构建三级品牌传导体系	53
第 7 章 研究结论及未来展望	54
7.1 研究结论	54
7.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55
参考文献	56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作为农业资源丰富且农村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乡村发展在国家战略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乡村的发展成为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从发展逻辑来看，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振兴，其根本路径在于通过产业创新培育内生发展动能，这既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驱动要素，也是夯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石性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乡村振兴属于系统性工程，其中产业兴旺占据关键地位。它不仅是达成生活富裕的必要条件，更是推动乡风文明以及实现治理有效的物质根基。由于地区之间存在着多样化的特性，产业兴旺在具体实践与达成路径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点。这就要求依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分类制定相应策略并加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准则。

乡村特色产业的繁荣发展，能够有效汇聚各类资源，吸引人才流入，其积极影响不仅体现在拉动乡村经济稳步增长方面，还为村民创造了更为丰富的就业契机，切实提升了他们的收入水平，进而有力地推动农村迈向繁荣兴盛的新阶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特色产业作为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其对当地发展的带动效应日益受到关注。带动效应的发挥是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结果体现，发挥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关键是要能带动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全面提升，从而达到乡村振兴的目标。

国家高度重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2020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目标是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其带动效应体现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此后 2021—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不

断强调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推动乡村产业全面升级，助力农村劳动力就业，缩小城乡差距。安徽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2021 年《安徽省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明确了乡村产业方向，谋划了乡村产业融合，带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提升乡村经济活力。同年《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指出，推进“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建设，打造徽茶等特色产业集群，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崛起，形成品牌效应。2023 年实施意见指出，要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产业发展，拓展产业链。D 县积极响应，出台众多政策。《D 县 2021 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民生工程实施方案》提升农民技能，带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2022 年全县春季农业科技服务活动方案》促进科技下乡，带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D 县 2024 年支持肉牛产业发展政策实施方案》推动肉牛产业发展，带动养殖、加工等相关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D 县作为典型的农业强县，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深厚的农耕文化积淀，在乡村特色产业培育方面成效显著。数据显示，该县农民人均收入连续 21 年稳居全省县级榜首，并持续入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行列，先后获得农业农村部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标准化、机械化领域，更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和“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的双重认定彰显其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D 县在特色产业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特色产业发展对区域发展的带动效应尚未得到科学验证，现有评价多聚焦于产业自身发展指标，而对特色产业在区域的经济提升、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环境改善等方面的外溢效应缺乏系统研判。这种评价机制的缺位，既制约着地方政府对既有发展模式的精准诊断，也不利于产业升级政策的动态调整。本研究主要是为了助力县域乡村发展。通过构建多维评价体系，科学评估特色产业对县域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分析各要素影响特色产业的机制，提炼出可复制的经验。研究成果不仅能帮助 D 县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还能为同类型县域解决“有产业无带动”的问题提供方法，形成乡村振兴的特色实践样本。

1.1.2 研究意义

1.1.2.1 理论意义

当前学术界对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研究呈现持续深化的态势，主要聚焦于三个研究维度：其一，基于国内外典型案例的区域产业模式解析，着重探讨本土化产业发展路径；其二，关注政府行为在产业带动机制中的角色定位与政策效能；其三，针对特定产业类型的带动效应进行专项研究。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维度，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本研究尝试构建多维评价模型，通过对 D 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实证分析，探索多维度整合的研究路径：在研究方法上，初步建立兼顾普遍性与区域差异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在研究视角上，尝试融合政府行为、市场机制与产业特性的三维分析框架；在理论探索层面，探索动态化、可复制的提升路径。这些探索期望能为现有研究提供有益补充，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1.1.2.2 现实意义

本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 D 县的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实际情况建立评价体系，客观地判断乡村特色产业的带动效应发挥水平，分析其影响因素，探索政府如何有效提升乡村特色产业的带动效应，能够推动区域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本研究不仅有助于 D 县系统梳理本区域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中的现存问题并实施动态优化，其研究结论还具有广泛的实践指导价值。具体而言，D 县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创新模式以及本文提出的政府干预策略，能够为其他县域提供可复制的理论和实践参考。通过这种经验推广机制，不仅可以强化乡村特色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还能为解决同类地区在发挥乡村特色产业示范带动效应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乡村特色产业的理论内涵

国外学界对乡村特色产业的学理探讨呈现出显著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从历史演进视角看，该领域的奠基性研究主要锚定于农业经济范畴，其核心是强调地理禀赋与传统文化的双轮驱动，主张通过整合本土自然资本与文化资本推动乡村发展。

18 世纪中后期, 亚当·斯密(1776)首次系统论证了绝对优势理论^[1], 作为理论演进的重要里程碑, 大卫·李嘉图(1817)创新性构建了比较优势理论模型^[2], 为乡村产业基于自身优势发展奠定理论基础。西奥多·W·舒尔茨(1964)指出, 乡村自身的农业发展应作为乡村发展的支柱产业, 是实现乡村发展的关键策略^[3]。Potter(1990)从特色农业内涵着手, 对特色农业概念界定与逻辑结构展开系统剖析, 强调特色农业发展需紧密结合当地资源优势, 尽可能构建规模化产业链, 从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4]。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1991)提出新观点, 从多维度分析资源分配不平衡现象, 认为农村地区因相对落后, 致使诸多优质资源难以充分利用, 导致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而发展特色产业能够依据自身特点发挥资源优势, 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5]。KojimaK(2000)指出区域特色产业通常由当地具备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 伴随技术、资金与人才的积累逐步发展而成^[6]。GabeT(2003)指出特色产业发展依赖当地特色优势资源、独特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 例如缅甸州本地化产业得益于其丰富的森林资源、大洋洲沿线地理位置以及温和海洋气候^[7]。Grey(2010)通过流通体系研究指出, 农产品向都市圈的定向输送不仅重构了城乡要素流动格局, 更催生出新型城乡互动机制, 这种空间经济整合显著提升了乡村经济系统的代谢效率^[8]。AlandeBrauW 等人(2013)基于东亚发展型农业的典型案例分析, 构建了地域特质识别机制的分析框架, 其以日本“一村一品”模式为研究对象, 特别强调土地集约化利用、经济作物定向培育与特色价值转化系统的协同发展构成了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三维路径^[9]。Halonen 等学者(2015)的跨国比较研究表明, 差异化要素禀赋的资本化运作可产生显著的内生性发展动能, 这种通过特色资源价值重塑形成的竞争优势, 为破解农村发展困境提供了创新路径^[10]。Lorente 等学者(2016)通过构建农场经营的多维度研究模型, 论证了生产主体在市场需求响应与生态承载力平衡之间的双重适应机制, 其研究结论揭示了构建动态化的环境—市场适配体系是维系农村经济可持续性的核心保障^[11]。

(2)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

国外学界在乡村特色产业政策研究领域已形成重要理论共识, 在推进乡村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制度安排中, 政府需承担制度供给者与资源配置协调者的双重角色。

西奥多·W·舒尔茨(1987)提出对传统农业加以改造有助于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通过提升农业水平,能够进一步助力农村地区实现经济增长,且在农业发展历程中,持续创新至关重要^[12]。Greene(1988)在分析乡村特色产业制度创新动力机制时提出,政府应当承担制度设计者与战略引导者的双重职能,其构建的“政府—机构—公众”三元协同治理体系,突出强调公共政策供给与市场—社会主体响应能力^[13]。冈纳·缪尔达尔(1992)进一步拓展治理理论边界,主张围绕乡村特色产业构建以公共部门为中枢的放射型治理网络^[14]。Sugiarti(2003)分析指出公共财政政策工具组合的战略性部署是破解乡村特色产业资源约束的关键路径^[15]。在此基础上,RonaldJ.Oakerson(2005)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乡村特色产业政策支持维度,提出要实现制度保障体系与信息基础设施的协同共建^[16]。Scott(2011)创新性地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解构为制度服务供给者、市场秩序维护者与战略创新策源者的复合型角色,强调制度创新与资源再配置对形成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关键作用^[17]。HaraldPechlaner(2012)研究聚焦品牌经济维度,通过南亚旅游产业的实证分析得出政府主导的品牌战略工程需要构建地域品牌价值链^[18]。

1.2.2 国内研究现状

(1) 乡村特色产业的理论内涵

国内学术界从多元视角对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展开了广泛研究与深入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于乡村特色产业的内涵,学者们观点各异。杨志良和姜安印(2021)提出,乡村特色产业是以乡村特色资源的比较优势为根基,布局于乡村空间范围,且兼具扶贫、文化传承等多元社会功能的产业类型^[19]。万俊毅(2022)指出,乡村特色产业既具备产业的一般性特征,又拥有独特之处,这一独特性体现于特殊的产品类别、特色品种以及所处的特色地域^[20]。许伟(2023)强调,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依托乡村特色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此类产业对推动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21]。赵若舒(2023)表示,乡村特色产业是在常规农业基础之上,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资源优势以及先进技术等独特要素,发展形成的具备一定规模的高效产业^[22]。

(2)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作用

在特色产业相关研究中，国内部分学者聚焦于发展特色产业的作用。他们普遍认为，特色产业的发展在推动农民增收、带动乡村进步、筑牢脱贫根基、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以及促进产业融合等多个方面，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永（2018）论证了乡村特色产业对农户收入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乡村产业体系的重构能有效促进农民生存资本积累速度，进而形成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内生动力^[23]。武青青（2019）通过研究得出特色产业对乡村发展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24]。王超群（2020）强调通过解码地方性知识谱系、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能够构建农业与文旅、创意产业的共生局面^[25]。李凤艳（2021）通过脱贫成果巩固视角研究得出群众创造力的释放需要依托制度性保障与市场化激励的协同作用，只有当增收动能转化为特色产业创新势能时，才能形成“富民”与“强业”的良性互馈机制^[26]。习楚琼（2022）分析得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具有空间经济调节器的战略功能，既能通过要素再配置巩固脱贫成果的基底，又能依托产业梯度转移优化城乡要素，最终实现防返贫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政策目标^[27]。

（3）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针对政府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开展了多视角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陈四辉（2011）研究得出在多元要素交织的乡村特色产业生态系统中，公共部门需承担制度供给主体与系统协调中枢的双重职能，强调通过三维治理路径实现乡村特色产业升级——基础性治理（生产条件优化与基础设施提质）、象征性治理（地理标志保护与文化符号塑造）以及规制性治理（技术标准体系与质量认证制度创新）^[28]。侯志阳（2021）创新性将政府主导的振兴工程解构为六大递进式治理模块：资源谱系测绘（多维度资产清单构建）、要素激活配置（存量资源价值转化）、关系网络调适（利益相关者协同机制）、矛盾消解创新（冲突预防与化解制度设计）、开放系统建构（外部资源链接与跨界协作）以及效能持续优化（动态评估与反馈调节）^[29]。

部分学者在系统探讨政府角色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李在力、张萧（2018）认为政府部门在特色产业规划中存在多重治理困境：战略规划层面的科学决策机制缺位导致资源配置偏离产业规律，基建配套滞后形成要素流动梗阻，产业生态单一化加剧市场风险集聚，政策工具碎片化削弱制度供给效能等^[30]。何

永珍（2019）提出政府为特色产业提供公共服务不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供给理念存在代际落差，组织架构维度呈现部门权责边界的模糊化特征，制度环境维度暴露监督评估体系的断裂等^[31]。韩喜平、王公博（2021）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乡村特色产业扶持过程中存在着目标置换与路径依赖的双重异化——行政系统通过“运动式治理工具包”（项目申报竞赛、指标摊派机制、绩效展示工程）维持表面治理效能，实则陷入政策施行与实质发展脱节的局面^[32]。

国内学术界关于政府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从不同维度总结了经验。裴新伟（2018）突破了乡村特色产业传统单一政策维度，构建起包含基础性制度（基建网络与金融支持）、发展性制度（教育培训与技术创新）、保障性制度（风险防控与品牌保护）的立体化供给体系^[33]。常冬海（2018）将乡村干部传统行政能力培养升级为“产业导师制实践教学”与“市场化跟班制实训”的复合培育模式^[34]。袁金选（2019）认为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政策扶持体系重构）、技术渗透（农技服务下沉机制）与组织变革（风险共担经营模式创新）的联动，有效破解乡村特色产业要素流通梗阻难题^[35]。王坤（2021）强调通过政策引导构建乡村特色产业梯度化人才储备体系，重点培育既掌握数字技术又深谙乡土逻辑的“数字新农人”^[36]。高鹏（2022）强调乡村特色产业政策需实现从“规模驱动”向“质量赋能”的转换^[37]。李卓、郑永君（2022）主张政府要进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量化评估，构建公共产品供给清单与市场作用负面清单的双向调适机制，理清政府与市场在特色产业发展中的职责边界^[38]。

（4）带动效应评价

目前有关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是对其它领域带动效应评价的研究。马玉波（2013）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带动效应评价的指标体系。他运用层次分析方法，依据专家打分数据算出各指标的权重值。接着，借助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黑龙江省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带动效应值逐个测定。最后，依据具体效应值对这些合作社进行排序，并对结果展开简要剖析^[39]。张慧静（2016）采用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手段，纵向剖析全球主题乐园的演进轨迹，横向对比不同区域实践模式的差异特征，揭示其空间布局规律与产业联动机制，提炼出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路径与产业协同发展经验，为政府优化文旅产业治理提供决策支持^[40]。刘阳（2018）聚焦澳门会展业研究，构建了衡量澳门

会展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澳门会展业发展水平指数,运用经典回归模型与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检验了澳门会展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41]。沈至忱(2022)分析了全国 281 个城市数据,将市场潜能指标作为经济带动效应的测度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高新区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42]。马如霞(2024)把农业科技园区试点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以 2007—2021 年河北省 167 个区县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两个维度,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河北省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的带动效应^[43]。

1.2.3 文献评述

经梳理可知,国内外学者从多元视角对乡村特色产业展开了研究与分析,涵盖理论探究与实证剖析,成果颇为丰硕。部分学者侧重于乡村特色产业的理论内涵研究,阐释产业发展背后的逻辑与机制;有的着眼于乡村特色产业在促进就业、提升居民收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研究;亦有学者针对政府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进程中的角色与作为进行探讨。

然而,当前已有文献存在一定短板。在带动效应研究上,多局限于单一层面,例如仅关注产业对就业的带动,缺乏从产业关联、社会发展、乡村振兴全局等多维度的整体考察,未能全面勾勒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全貌。从研究范围来看,大多以省或地级市为研究单元,研究范畴宽泛且宏观。这种宏观视角虽能把握整体趋势,但难以深入洞察县域这一微观层面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县域作为乡村发展的关键行政单元,其产业发展的资源禀赋、政策执行及面临挑战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现有研究在这方面着力甚少。鉴于此,本研究在汲取现有成果精华的基础上,将目光锁定于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这一具体对象。通过构建适配的评价体系,从多维度对其进行整体审视与综合评估,深入剖析影响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水平的各类因素,并据此提出切实可行的政府干预策略,以期为县域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研究与实践注入新的活力与思路。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1.3.1 研究思路

本文以 D 县这一典型农业强县为研究对象,基于有效政府理论、协同治理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研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分析法,按照“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辨逻辑对论文进行综合分析。首先，充分了解了 D 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成效；其次，从经济提升、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环境改善等维度构建了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2018—2022 年的数据，运用熵值法对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进行测度与分析，并进一步剖析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促进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的政府干预策略，为政府部门优化特色产业支持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启发国内其他地区优化地方政府职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本文技术路线图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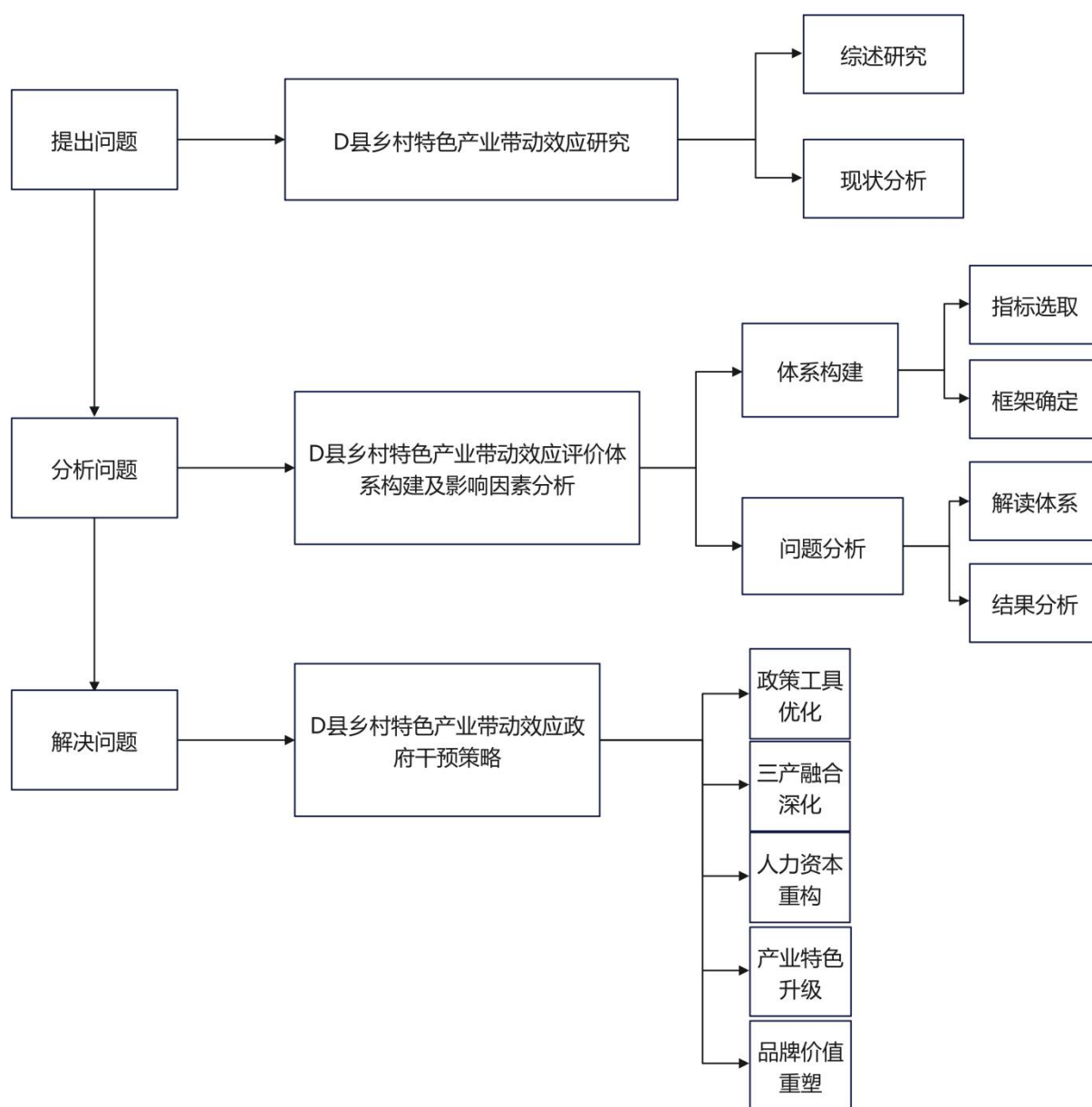


图 1-1 技术路线图

1.3.2 研究内容

第 1 章绪论。本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

第 2 章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本部分系统梳理论文的核心概念和研究范围。阐述了研究对象涉及的有关概念和理论，对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等概念进行界定，阐述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有效政府理论、协同治理理论。

第 3 章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概况。本部分主要阐述 D 县基本情况、D 县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历程、D 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成效。

第 4 章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这部分在介绍指标体系的功能和设计原则的基础上，选取合适的评价方法，构建由 4 个二级指标和 18 个三级指标构成的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体系，分别对整体及分指标进行评价分析。

第 5 章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影响因素分析。该部分结合 D 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情况，在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结果基础上来剖析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

第 6 章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政府干预策略。该部分结合当前 D 县乡村发展实际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建议，为 D 县政府有效引导提升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提供思路。

第 7 章研究结论及未来展望。该部分主要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指出论文的不足之处。

1.4 研究方法

1.4.1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一种通过对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综合，以获取相关信息、知识和结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已有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查阅、分析和研究，来了解特定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探索事物的本质、规律和相互关系，为研究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事实依据和研究思路，以支持新的研究或解决实际问题。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等学术数据库，以“乡村特色产业”“产业带动效应”等为核心检索词，系统收集近五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依托权威政策发布平台（如农业农村部官网、人民网等），全面梳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关于“三

农”问题的政策文本与理论阐释。在文献分析过程中，对收集到的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及行业白皮书进行系统梳理与批判性分析，重点关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政策工具及其带动效应评估等前沿议题。通过整合前沿研究成果与政策实践经验，构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1.4.2 实地调研法

实地调研法是一种深入到研究对象所处的实际环境中，通过直接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收集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方法。旨在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行为、态度和环境等，获取关于研究问题的详细、真实和全面的信息，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关系，为解决问题、制定政策或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

本文通过实地走访，结合专家访谈和文件收集等方式获取相关评价指标的数值。通过真实有效的数据归纳分析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特征，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依据。

1.4.3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分析法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分析法是一种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种方法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以更全面、深入地研究问题的方法。综合运用定量分析的精确性和定性分析的深入性，既通过数据和统计方法揭示研究对象的数量特征、关系和变化规律，又从性质、特征、意义等方面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理解和诠释，旨在全面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情况，为决策和研究提供依据。

本文通过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体系测度的量化结果，对D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进行定量分析，结合调研了解的特色产业发展现状与测评结果，对带动水平、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定性分析。

1.5 创新点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聚焦于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视角，深入探究县域通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当下，学界针对乡村特色产业的研究多围绕产业自身发展，诸如产业的培育、壮大以及转型升级等方面，而对于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即产业如何拉动就业、促进增收、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以及推动乡村整体进步等层面的研究较少。从县级政府职能履行与优化视角切入，剖析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

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农业发展态势良好的 D 县为典型案例，以其乡村特色产业带动作用为切入点，紧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深入审视 D 县政府在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过程中的职能履行状况。详细分析 D 县政府在发展特色产业时，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情况以及带动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政府干预策略。本研究不仅完善了从县级政府职能视角研究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方面的研究，更期望为其他县域在优化政府职能、借助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方面，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范例与实践指引。

第2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乡村产业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2号）对乡村产业的内涵界定为：“乡村产业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是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产业。”乡村产业涵盖种植养殖、特色手工艺、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生活服务等各个领域。关于如何界定这些活动，学者们提出了不同视角。代合治（1997）将农村地区的产业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传统农业生产，二是农村地区发展的工厂、商店等非农产业。这个定义重点强调乡村产业的地理位置特征^[44]。卞广萌、程文（2017）作出了补充，乡村产业不仅包括看得见的加工厂、合作社等实体，还涉及特色物产开发、物流运输网络等动态经济形式，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农村特有的产业生态^[45]。邱俊杰，余劲（2023）提出将快递服务站、农村电商等新兴服务业作为基础支撑，把智慧农业、特色民宿等视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方向。这种分类既考虑各地发展共性，也兼顾不同乡村的资源特色^[46]。本文所理解的乡村产业，是在乡村地域内生长、存续并发展的所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具有多种业态融合并存的特性。

2.1.2 特色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姚君慧（2023）界定了特色产业的历史范畴，强调其包含传统手工艺制品与商业化农业经营两大类型，其研究溯源指出，此类产业的早期形态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领域^[47]。周丽娟等（2023）提出特色产业的竞争力源于三大差异化要素禀赋：一是稀缺性自然资源的独占性开发，二是核心技术能力的持续积累，三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定向培育^[48]。贾宁（202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特色产业的本质属性，认为需通过产业

辨识度建构与区位竞争优势培育的双重路径,实现特色资源向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从而驱动县域经济系统的能级提升^[49]。本文认为,特色产业是在基础产业功能框架下,依托特定地理单元的要素禀赋结构与经济社会基础,通过差异化发展路径形成比较优势,最终实现区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协同增长的产业形态。该定义包含三个核心维度:其一,遵循产业发展普遍规律;其二,根植地域特色资源禀赋;其三,具备竞争优势转化机制。

2.1.3 乡村特色产业

乡村特色产业与一般性乡村产业的核心区别体现在“特色”维度。其理论内核在于通过差异化竞争策略形成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的创新特质:首先是以地域资源禀赋为基础形成的差异化产业形态,其次是依托文化传承或技术创新构建的特色经营模式,最后是针对特定消费群体需求开发的價值创造体系。这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乡村特色产业区别于传统农业的本质特征。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及“乡村特色产业”,指出乡村产业应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鼓励乡村开展中药材种植、养殖、杂粮杂豆种植等经济作物生产。杨亚东等(2020)指出此类产业本质上是基于农村生态资源禀赋形成的差异化产业形态,其核心特征体现在细分领域产业化进程与品牌价值建构的双向互动,具体涵盖特色农业、传统制造及文化创意等产业门类^[51]。杨志良、姜安印(2021)等人系统阐释,其应兼具三重功能属性:一是依托区位要素禀赋形成的市场竞争优势,二是承担社会价值创造的复合功能(包括减贫实践、文化赓续与生态维护),三是构建产业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共生机制^[19]。肖卫东(2023)强调该类产业需满足“地域依附性”与“价值独特性”双重标准,其发展路径必须植根本土资源要素的不可替代性^[52]。郭雨柔(2023)提出判定基准应包含空间维度与产业维度的双重特异性——既在区域内部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效应,又在跨区域竞争中确立差异化优势地位,其发展基础主要源于地理区位的独特性与自然条件的专属性,典型形态包括依托生态资源的种植、养殖等经济体系^[53]。

本研究综合政策导向与学术共识,对乡村特色产业形成如下界定:以农村独有的山水资源、传统手工艺等为基础,由本地农户主导,能体现地方特色的经济活动。其本质特征表现为三个核心维度:一是资源基础,深度整合自然生态与传统人文资源禀赋;二是发展路径,遵循差异化定位形成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三是

价值创造，实现经济增值、社会进步、文化传承与生态维护的协同发展。具体来说，这类产业包括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类型，通过把家乡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既能让农民在家门口赚钱，又能让乡村发展更有后劲，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的全面提升。

2.1.4 带动效应

效应指涉事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综合影响及其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这一概念在经济学领域具有特定理论内涵，通常用于分析消费者通过商品或服务消费所获得的主观价值判断。由于人类心理认知的主观性特征，以及社会互动关系的复杂性，效应往往呈现出显著的示范性与带动性。这种现象既包含个体消费决策的心理满足感，也涵盖群体行为模式的相互影响，从而形成具有动态特征的价值创造体系。Duesenberry（1949）的消费理论中提到，个体消费行为并非仅由自身意愿决定，还常受所在群体中他人行为的影响，即他人的行为选择会对个体消费者产生示范效应，随着外部示范作用不断扩散，拥有更多优势资源的个体或组织，能够进一步辐射带动周边资源相对匮乏的个体或组织，通过资金、信息、技术、人才、先进经验等资源的传递，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同发展，从而引发带动效应^[54]。

对于乡村特色产业和区域发展而言，这种带动存在双向赋能的协同机制。这种共生关系表现为：特色产业通过资源整合与创新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持续进步、文化传承创新以及生态环境改善产生多维赋能效应；同时，区域发展通过政策支持、基础设施配套和市场网络构建，为特色产业规模化扩张、集约化经营和现代化转型提供必要支撑。二者通过要素流动、知识溢出和价值共创，形成具有带动效应的生态系统。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这种协同发展模式不仅能够提升特色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还能有效促进城乡资源双向流动，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2 理论基础

2.2.1 有效政府理论

199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明确提出了“有效政府”这一概念，并着重强调，有效政府乃是确保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前提与坚实基础。在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研究语境下，有效政府的重要性尤为凸显。其在行政过程中的有效性，直接关乎产业带动效能的发挥，是实现产业振兴、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政府权威性与政治稳定性在乡村领域的重要保障。

有效政府理论以行政生态理论为基石延伸发展而来。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行政学家里格斯在《行政生态学》中深刻指出，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效率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紧密相连。就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而言，乡村独特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要求政府行政必须具备更高的灵活性、多样性与有效性。例如，在某些民俗文化浓郁的乡村发展特色文旅产业，政府需依据当地独特的文化氛围和村民的参与意愿，灵活制定产业引导政策，以激发产业对乡村经济、就业等方面的带动潜力。

有效政府理论以有限政府理论为前提。19 世纪中期，洛克在《政府论》中清晰阐述了有限政府的理论核心，点明有限政府实质上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55]。但在实际发展进程中，面对诸如市场失灵等复杂状况，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既离不开高效的市场机制，也需要积极作为的政府。在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发挥中，这一观点同样适用。判断政府在产业带动中的功能优劣，并非取决于政府规模大小，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效能与效率。若政府无法有效引导产业，即便投入大量资源，乡村特色产业的带动效应也难以充分彰显，无法实现产业创新与突破，难以达成促进乡村全面发展的目标。

有效政府不仅仅体现在运作过程与价值取向上，更直观地反映在运作结果上。在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研究范畴内，构建有效政府意味着政府需持续优化职能、提升能力、提高效率。政府应精准定位自身在乡村特色产业带动中的角色，积极协调各方资源，为乡村特色产业搭建发展平台。例如，通过建设产业园区，吸引企业入驻，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组织专业培训，提升农户生产技能，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产业竞争力。本文以该理论为指引，深入剖析政府在当前引导乡村特色产业发挥带动效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探索政府如何高效行使职能，从而有效引导当地乡村特色产业充分释放带动效应，切实发挥政府作用，成为推动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政府。

2.2.2 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发轫于西方国家，它兼收并蓄了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先进性和适应性，在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研究领域展现出独特价值。该理论把整个社

会看作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系统内包含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公民等诸多子系统。在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发挥进程中，这些子系统各自扮演关键角色，共同发力推动整个社会系统高效运转，致力于最大程度维护和提升社会公共利益，这其中就涵盖乡村特色产业带动下的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乡村环境改善等公共利益成果。

在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协同治理理论强调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机制，突破传统科层制治理的路径依赖。该理论主张在平等协商基础上，通过资源整合与利益协调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以乡村特色产业带动就业为例，政府制定就业扶持政策，企业提供工作岗位，非政府组织开展就业培训，公民参与就业，通过各主体协同合作，实现就业规模扩大与劳动者收入提升的双赢。协同治理绝非浮于表面的多主体形式组合，其核心在于治理过程中各主体间深度的协同性。

从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视角来看，协同治理具备以下显著特征：在治理主体层面，强调多元主体全方位参与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的全过程。政府凭借政策制定与资源调配，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企业投入资金、技术，推动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增强产业辐射带动能力；个人（农户）作为产业基础参与者，贡献劳动力与特色产品；其他社会力量如行业协会，助力规范产业标准，提升产业整体影响力，共同促进产业带动效应的释放。在治理过程方面，突出协同性意味着不再完全依赖政府，而是主张通过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治理网络，实现多方利益诉求的有机统一。例如在乡村特色农产品销售中，政府负责搭建销售平台、制定市场规则，企业承担产品加工、市场开拓任务，农户保障产品供应，通过三方协同，提升农产品销售效率，强化产业带动增收效应。在管理方式上，既有正式制度的刚性约束，像政府出台的产业带动相关政策法规、质量监管制度等；也存在非正式制度的柔性运作，例如乡村传统商业信誉、邻里互助习惯等，共同保障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在规范有序的环境中持续发挥。就治理目标而言，各参与主体尽管利益诉求存在差异，但在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中目标一致，即通过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政府期望借此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促进产业繁荣带动相关领域发展；农户渴望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质量。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下，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发挥涉及政府、企业、农户等多元治理主体。尽管各主体存在差异化利益诉求，但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形成了目标共识，客观上要求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协同治理理论为分析县级政府职能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合作实现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治理效能的提升。在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进程中，县级政府作为治理网络的核心枢纽，需要与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建立协同合作关系。这种协同机制既包括产业规划层面的顶层设计协作，也涵盖具体实施环节的资源整合。例如，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与企业共建产业孵化平台，能够有效破解技术推广难题；与农户合作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则可提升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些实践案例表明，协同治理理论不仅能够解释多元主体的互动逻辑，还能为优化政府职能边界提供理论依据。将协同治理理论引入乡村振兴研究，具有显著的理论创新价值。该理论框架强调政府在制度供给、公共品投入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构建“目标共识－资源互补－利益共享”的协同机制，能够有效协调不同主体的价值取向，形成推动产业发展的合力。这种理论应用不仅有助于优化政府治理效能评价体系，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创新治理依据。

第3章 D县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概况

3.1 D县基本情况

D县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位于南京、马鞍山与芜湖三市交会区域，是安徽省的东部门户及南京都市圈的重要卫星城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节点城市，县域总面积达 970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 41.8 万，下辖 10 个乡镇及 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其在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参与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的战略地位。近年来，D 县各项工作持续走在全省县级第一方阵前列，连续多年入选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2023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05.7 亿元，增长 7.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2857 元，增长 5.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351 元，增长 8.1%。

D 县种养殖资源得天独厚，全县耕地面积 63.67 万亩，已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面积 42.57 万亩，是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粮棉油生产大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国家“九五”第二批商品粮基地县、全国油菜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县、全国油菜化肥农药减施综合模式应用示范县、安徽省首批优质专用粮食生产示范基地县。在《安徽省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中，被列为优质水稻和优质油菜等农产品优势产区，粮油产量和品质在省内长期处于较高水平。D 县位于长江下游江南水网核心区域，渔业资源禀赋优越。县域内涵盖江河、湖泊、池塘等多种水体类型，水域总面积达 34.5 万亩，形成了具有生态多样性特征的水产养殖体系。凭借独特的地理环境与资源优势，该县已发展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淡水产品生产基地，先后被授予安徽省水产大县、全国河蟹养殖强县、“中国生态养蟹第一县”等称号。2023 年全县水产养殖面积 39.2 万亩，实现全域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

3.2 D县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历程

早期至 2002 年，D 县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悠久的螃蟹养殖历史，但养殖方式相对传统，效益不高。此时，D 县养殖方式逐渐由天然捕捞向人工放养转变，螃蟹养殖规模逐渐扩大，但养殖技术和效益仍有待提升。2002 年至 2020 年代初，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传统养殖方式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需要提升养殖技术和效益。2002年,D县与上海海洋大学(原为上海水产大学)编制实施了《D县河蟹振兴工程》,总结出了“种草、投螺、稀放、配养”的生态养殖“D县模式”,并在全国推广。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如《D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等,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D县模式”得到广泛推广,螃蟹养殖技术和效益显著提升。乡村振兴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一批乡村振兴示范点、示范村开始建设。2021年至今,D县开始探索如何进一步提升螃蟹养殖的附加值,促进全产业链发展,以及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2021年,D县与上海海洋大学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构建“1+3+N”产学研合作机制,积极开展新技术集成开发,改造升级河蟹养殖技术模式。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和项目,如编制乡村振兴示范点规划、实施产业发展、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启动了“158”行动计划,持续加大投入,做大做强以河蟹生态养殖为主的特色水产养殖业,并推动其他优势产业全产业链发展。螃蟹养殖技术进一步提升,生态养殖成为主流,螃蟹品质和附加值显著提高。全产业链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集苗种繁育、生态养殖、螃蟹加工、电商物流于一体的产业链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D县在农村现代化建设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一批美丽乡村省级中心村建成,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在全省县域经济发展中位居前列。值得关注的是,该县成功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与生态养殖示范区,成为全省首批以县域为单位获批该资质的地区之一,这一成果标志着当地渔业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阶段性突破。D县螃蟹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D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和提升的过程,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当地成功解决了养殖技术、产业链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问题,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3 D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成效

D县通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取得显著成效,探索出以资源禀赋为基础、以产业适配性为导向的差异化发展路径。这种“宜农则农、宜渔则渔、宜旅则旅”的产业选择机制,不仅实现了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构建起具有地域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3.3.1 D 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1）粮油产业：全链条标准化实践

作为全国粮油产业标杆县，D 县构建“品种—种植—加工—品牌”全链体系。依托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优势，形成优质水稻、油菜双轮驱动格局。2023 年数据显示，全县粮食种植面积达 78.2 万亩，总产量 31.6 万吨，其中 96.9% 的小麦、86.9% 的稻谷实现优质化种植。创新性推广的“三全高效”模式，通过全价值链开发实现亩均收益提升 23%，区域公共品牌“姑溪河大米”进入全国名特优新产品目录，并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已认证绿色稻米 12 个，绿色认证稻米覆盖全县 30% 生产基地。其独创的化肥农药减施技术体系已被纳入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名录，形成可量化的生态种植标准。

（2）水产产业：生态品牌化突围

立足 34.5 万亩水域资源，D 县构建“蟹—虾—鱼”立体养殖体系。2023 年蟹产业综合产值突破 25 亿元，其中“金脚红毛”贡蟹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淡水名蟹之一，单品溢价率达 300%。通过十八届螃蟹文化节形成的品牌矩阵，带动长三角地区市场占有率提升至 18%。首创的“蟹种培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三级体系，使蟹种年供应量占全国市场的 12%，蟹肉提取物等深加工产品附加值提升 5 倍。其“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在第四届中国名蟹大赛中获评示范案例。

（3）果蔬产业：地理标志驱动增值

依托百年种植传统，形成“北桃南葡”特色布局。2023 年桃花村 7000 亩桃林通过品种改良实现错峰供应，主要栽植油桃、黄金蜜等桃品种，种出的桃子甜度大、口感好、卖相也好，年产桃鲜果 1400 多万斤，桃胶 10 万斤，年产值突破 5600 万元。“大陇葡萄”地理标志认证带动标准化种植面积扩大至 3500 亩，设施农业占比达 41%。汤臣现代农业小镇的碧根果产业化项目，构建“种苗研发—规模种植—功能食品开发”垂直产业链，规划用地 10000 余亩，目前已完成建设碧根果示范种植基地 2000 余亩，涵盖育苗基地、良种采穗圃和示范种植基地。目前基地已种植系列规格的碧根果良种近百万株，预计年产鲜食碧根果 1000 吨，蛋白饮 2000 吨，碧根果油 500 吨，实现从初级农产品到健康食品的跨越。

（4）畜禽产业：循环农业范式创新

以“生态位”理念重构畜牧业，形成种养闭环系统。大田养鸡模式使土鸡规

模养殖密度下降 40%，肉质评级提升两级；“猪-沼-菜”系统实现废弃物 100% 资源化，带动关联蔬菜基地亩均节约成本 1200 元。2023 年 D 县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 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100%，生猪养殖综合成本下降 18%，构建起全国领先的畜牧业绿色认证体系。

（5）农文旅融合：场景化价值再造

深度挖掘“李白文化+农耕文明”双 IP 价值，形成文化研学游、花岛生态游、江南水乡游、湿地体验游、主题休闲游 5 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桃花村通过“三生融合”（生产、生态、生活）改造，年接待研学游客超 5 万人次。江心洲乡村旅游节创新“农业认养+文旅体验”模式，使游客复游率达 65%。19 个特色农业园差异化发展，甌山生态园聚焦康养度假，水墨农庄深耕非遗体验，形成“一园一主题”的协同发展格局。

（6）加工集群：垂直整合突破

“一区三园”空间布局实现产业链地理集聚效应，即以蔬菜加工为主的黄池农产品加工区，以畜禽加工为主的县经济开发区农产品加工园，以水产品加工为主的石桥工业集中区农产品加工园，以粮油加工为主的姑孰工业集中区农产品加工园。2023 年新培育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3 家，获批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1 个、总数达 6 个。2 个乡镇成功创建国家农业产业强镇。2023 年全县实现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175 亿元。

3.3.2 D 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成效

（1）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创新突破

创新机制激发发展活力。通过建立村级集体经济项目“赛马大会”竞争机制，搭建项目展示与资金扶持平台，有效激发基层发展动能。2023 年成功申报 28 个市级扶持项目，推动集体经济总收益突破 1.26 亿元，同比增长 15%，实现村均收入超百万的历史性跨越，50 万元以上村实现全域覆盖。其中，“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基地”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2 个基地分别跻身省级认定和创建名单。

要素整合强化造血功能。统筹运用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与上级帮扶资金，精准实施“百千万工程”。通过建立“项目背景—实施方案—预期效益”全流程评估体系，引导各村立足资源禀赋，创新培育果蔬分拣中心、冷链物流等 32 个特色项目，形成“一村一品”差异化发展格局。创新实施“头雁领航”计划，培育返

乡创业项目 18 个，带动社会资本投入超 5000 万元。

（2）产业集群效应显著增强

产业布局优化升级。构建“一核三翼”现代农业园区体系，形成年产值 175 亿元的产业集群。其中：黄池农产品加工区建成蔬菜加工集散基地，年处理能力达 10 万吨；县经济开发区畜禽加工园培育省级龙头企业 5 家，建成多条生猪屠宰生产线；石桥水产品加工园打造长三角优质水产品供应链，年交易额逐年上升；姑孰粮油加工园实现稻米全产业链开发，产品附加值提升 35%。

基础设施迭代更新。实施园区升级工程，新建标准化厂房 15 万 m²、智能化冷库 8 座，配套建设检验检测中心、电商直播基地等公共服务平台。引入 5G 物联网技术，实现生产加工全程可追溯，带动园区企业数字化改造率达 68%。

（3）经营主体培育成果丰硕

新型经营体系日趋完善。构建“龙头企业+联合体+合作社+农户”四级联动机制，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 家、省级 12 家，组建产业化联合体 10 个。创新“保底收益+二次分红”等利益联结模式，带动 3.2 万农户户均增收 2300 元。家庭农场总量达 1168 家，其中智慧农场占比提升至 42%。

要素保障持续强化。建立“财政+金融+保险”三位一体扶持体系，创新推出“乡村振兴贷”“新农保”等金融产品，累计发放贷款 8.7 亿元。实施“新农人培育工程”，开展电商运营、品牌营销等专题培训 56 场次，培育高素质农民 1800 人次，新型职业农民持证率达 91%。

（4）三产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生态价值高效转化。打造“精致大青山”生态经济示范区，建成桃花村民宿集群、青山客厅等文旅项目，培育九间堂等国家级旅游民宿品牌。2023 年接待游客 128.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 亿元，带动周边农户户均旅游增收 1.2 万元。

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创新“产业反哺”机制，将集体经济收益的 30%定向投入乡村建设，累计完成 69 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建设，2023 年建成生态停车场 26 处、文化广场 15 个。通过“家门口就业”工程，实现 1.8 万留守群体就近就业，县域就业承载力提升至 92%。

通过系统推进乡村特色产业体系建设，D 县走出了一条“产业增值、集体增

效、农民增收、乡村增色”的融合发展之路。

第4章 D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

通过前文对D县乡村特色产业培育路径与发展成效的系统梳理,可见其在产业规模扩张、特色品牌塑造等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果。然而,乡村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产业本体成长,更应考量其作为乡村振兴引擎的辐射带动效能。在乡村产业基础逐步夯实的当下,如何科学评估乡村特色产业对县域经济结构优化、三产融合发展及社会效益提升的牵引作用,已成为关乎特色产业政策持续性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命题。本章将构建多维度评价体系,重点考察乡村特色产业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层面的外溢效应,为后续探讨产业升级助力县域发展路径提供实证依据。

4.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1.1 评价指标体系功能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体系应具备以下功能:一要能准确地表现出D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的具体情况;二要为D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研究的综合分析,提供真实有效的量化结果,使研究结果和对策建议更具有说服力。

4.1.2 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质量取决于其组成要素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所选指标需满足:一是具有典型性与辨识度,能够系统表征评价对象的本质属性,二是具有可靠性与有效性,能够保持测量维度与研究目标的适配性。因此,设计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一定的构建原则:

(1) 系统性原则

在选取指标的时候,一定要保证选取的指标是成系统架构的。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体系是一个多层次、较复杂的系统体系,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多个维度。我们在选取指标的时候,要在围绕本文研究内涵的基础上,坚持系统性原则,全面选取反映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指标。

(2) 科学性原则

该原则要求指标体系建构过程满足双重科学标准：首先，理论架构须确保观测维度与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契合；其次，量化模型须具备实证基础，通过度量方法验证指标与带动效应的因果关联性。

（3）可比性原则

构建乡村特色产业的带动效应评价指标需要遵守可比性原则。也就是说在设置评价指标时候，需要保证获取的指标是在同一空间范围、同一标准的可比环境下的。这样才能保证真实地测量出 D 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带动效应。

（4）可行性原则

在选取指标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指标的可行性，选取的指标要有可计量的属性，尽量避免使用定性类型的指标，只有可操作、易理解的指标，在实际作用上才是有价值的。定量的指标一般选取《统计年鉴》或者统计公报上公示的指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结合实际，保证所分析出的结果在实际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4.1.3 评价指标构建依据

若要构建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明晰国家对于当前乡村产业振兴提出的新要求。乡村产业振兴不同于以往的“产业发展”，产业发展更多地关注产业自身的成长、进化以及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其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优化，乡村产业振兴则更侧重于通过推动乡村产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它不仅仅关注产业的增长，更注重的是如何通过这些产业的发展带动乡村经济的整体提升和社会的进步。乡村特色产业发挥带动效应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举措，有助于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目标。

乡村产业振兴对于乡村特色产业发挥带动效应的要求具体可包括以下几点：

（1）能够有效带动乡村经济提升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可以推动农业从传统的种植模式向更加多元化、高效化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还促进了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了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从而提升了乡村经济的整体水平。同时，乡村特色产业往往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能够为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能够有效带动乡村社会进步

特色产业的发展是推动乡村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通过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特色产业够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生产。这种现代化生产方式不仅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还增强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特色产业的发展还能带动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3）能够有效带动乡村文化繁荣

乡村特色产业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品牌效应。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可以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和文化品牌，提升乡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者前来参观和投资，进一步推动乡村发展。

（4）能够有效带动乡村环境改善

乡村特色产业通常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行开发，这有助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可以引导农民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特色产业还能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走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

因此，本文将从经济提升、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环境改善 4 个方面构建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指标体系。

4.1.4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等官方文件，考虑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实际情况，根据颜双波（2017）^[56]、于超等（2022）^[57]、梁俊芬等（2022）^[58]已有学者研究基础上构建以下指标体系。构建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提升、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环境改善 4 个二级指标，18 个三级指标。其中 5 个具体指标反映经济提升、4 个具体指标反映社会进步、5 个具体指标反映文化繁荣、4 个具体指标反映环境改善。

表 4-1 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属性	序号
D 县乡村 特色产业	经济 提升	农业产值	亿元	+	X11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亿元	+	X12

带动效应 评价指标 体系		城乡居民收入比	%	-	X1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X14
		村均集体经济收入	万元	+	X15
	社会进步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个	+	X21
		农业机械化水平	千瓦	+	X22
		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万亩	+	X23
		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数量	个	+	X24
		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数量	个	+	X25
	文化繁荣	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数量	个	+	X31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次	万人	+	X32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个	+	X33
		“三品一标”产品数量	个	+	X34
	环境改善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吨	-	X41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	+	X42
		化肥施用量	吨	-	X43
		农药施用量	吨	-	X44

4.1.5 分指标解释

(1) 经济提升指标

1) 农业产值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能够全面提升农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农业产值反映了农业产业发展在整体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成果，体现了农业经济效益。

2)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服务业逐渐引入智能化、数字化等先进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有效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带动了农林牧渔服务业的繁荣。

3) 城乡居民收入比

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比是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比值越低说明城乡发展越平衡。

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能够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实现农户的收入增长。因此本文选取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来反映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

5) 村均集体经济收入

每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优势，通过因地制宜挖掘和培育特色产业，形成“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能够有效提升村集体经济收入。

(2) 社会进步指标

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随着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会有所增加。特色产业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和资源进入农业领域，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有助于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结构，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可以吸引更多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提升整体的农业经营水平。

2) 农业机械化水平

随着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对农业机械化水平要求越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是考虑农村未来发展要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农业机械化是其重要的支撑，农业机械化率越高，单位面积的产出及土地利用效率就会越高，本文利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反映农业机械化水平。

3) 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需要高效的农业生产条件，这促使高标准农田建设更加注重沟、渠、路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和完善，提高农田的灌溉和排水能力，实现宜机化耕作模式，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以及可持续发展，通过平田整地、建设农田林网等措施改善农村面貌，使农村的形象变得更好。

4) 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数量

特色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乡村经济的增长，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从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例如，通过发展特色种养殖产业，可以整合零散土地资源，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流入，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持续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3）文化繁荣指标

1) 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数量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是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天然融合体，产业链长、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能够推动农业与休闲旅游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发展模式

2)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次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了乡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吸引更多游客参观游览。

3)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能够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乡村特色产品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的体现。

4) “三品一标”产品数量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强调产品质量的提升、打造地域品牌、全产业链发展，这与“三品一标”中对农产品的要求契合。

（4）环境改善指标

1)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当乡村特色产业得到发展时，农民更倾向于采用环保、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从而减少对农用塑料薄膜的依赖。同时，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环保意识的提升，农民也更有可能选择使用新型覆盖材料或采用其他农业技术来替代传统的塑料薄膜。

2)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畜禽粪污是种植农作物的肥料来源，经有效处理后还田既可以为农作物提供养分，也可为耕地提供大量有机质。乡村特色产业如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对有机肥等资源利用产品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这推动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的提升。

3) 化肥施用强度

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化肥施用技术的进步。例如，为了满足特色作物的生长需求，农民可能会采用更加精准和高效的施肥技术，如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这些技术有助于减少化肥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

4) 农药施用强度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往往强调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通过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如生物农药、天敌昆虫、理化诱控等，可以有效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降低农药施用强度。

4.2 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4.2.1 测度方法选择

本文主要采用熵值法对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进行测度评价。

具体原理如下：

第一步，建立评价矩阵

构建多个指标矩阵时，假设设有 a 个评价对象， b 个评价指标， x_{ij} 为第 i 个评价对象下的第 j 个评价指标所对应的数据 ($i=1, 2, \dots, m; j=1, 2, \dots, n$)。形成原始数据矩阵：

$$X_{ij} = \begin{bmatrix} x_{11} & x_{12} & \cdots & x_{1n} \\ x_{21} & x_{22} & \cdots & x_{2n} \\ \vdots & \vdots & \cdots & \vdots \\ x_{m1} & x_{m2} & \cdots & x_{mn} \end{bmatrix} \quad (1)$$

第二步，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不同性质的指标会对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在计算过程中要除去量纲的影响，对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处理过程如下：

对于正向性指标的处理为：

$$y_{ij} = \frac{x_{ij} - \min(x_j)}{\max(x_j) - \min(x_j)} \quad (2)$$

对于负向性指标的处理为：

$$y_{ij} = \frac{\max(x_j) - x_{ij}}{\max(x_j) - \min(x_j)} \quad (3)$$

对于适度性指标的处理为：

$$y_{ij} = 1 - \frac{|x_{ij} - d_{best}|}{\max |x_{ij} - d_{best}|} \quad (4)$$

为保证标准化处理后指标的有效性，在结果后增加 0.0001。

第三步，定义标准化值

计算各评价对象下第 n 个指标的比重，如下所示：

$$P_{ij} = \frac{y_{ij}}{\sum_{i=1}^m y_{ij}} \quad (5)$$

第四步，计算熵值

$$e_j = -\frac{1}{\ln n} \sum_{i=1}^n p_{ij} \ln p_{ij} \quad (6)$$

第五步，计算指标的变异程度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变异程度，如下所示：

$$g_j = 1 - e_j \quad (7)$$

第六步，计算指标权重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w_j = \frac{g_j}{\sum_{i=1}^m g_j} \quad (8)$$

第七步，计算综合得分

$$z_{ij} = w_j * y_{ij} \quad (9)$$

4.2.2 数据来源

数据的准确收集是正确测度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基础。本文为保证数据的准确可靠以及兼顾可比的原则，所有的数据均来自官方统计出版物和官方网站。由于本文所获取的数据为县域数据，因此获取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M 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D 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二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官网、地理标志网等官方网站；三是 D 县政府工作报告、D 县农业农村局工作报告、D 县政府网站、官方公众号等。基于以上渠道获取有关指标原始数据，但由于县域数据获取的难度较大，因此部分缺失数据采取线性插值法补齐。

4.3 测度结果及评价标准

4.3.1 测度结果

根据上述熵值法的计算公式，计算出各个二级指标的熵值、差异系数及权重，如表 4-2。

表 4-2 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指标权重

指标	熵值	差异系数	权重
农业产值	0.816055	0.183945	0.038259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0.764041	0.235959	0.049077
城乡居民收入比	0.764301	0.235699	0.04902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784085	0.215915	0.044908
村均集体经济收入	0.814892	0.185108	0.038501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0.684627	0.315373	0.065595
农业机械化水平	0.289601	0.710399	0.147756
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0.706618	0.293382	0.061021
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数量	0.82919	0.17081	0.035527
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数量	0.814656	0.185344	0.03855
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数量	0.655966	0.344034	0.071556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次	0.763435	0.236565	0.049203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0.431628	0.568372	0.118216
“三品一标”产品数量	0.739932	0.260068	0.054092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0.814683	0.185317	0.038544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0.826828	0.173172	0.036018
化肥施用量	0.844919	0.155081	0.032255
农药使用量	0.846635	0.153365	0.031899

数据来源：根据模型结果整理

进一步计算出，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 2018 年至 2022 年各三级指标得分，如表 4-3。

表 4-3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各三级指标得分

指标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农业产值	0.000004	0.012476	0.021468	0.02872	0.038263
农林牧渔服务业 产值	0.000005	0.008184	0.021272	0.032723	0.049082

城乡居民收入比	0.000005	0.007013	0.026807	0.031802	0.049028
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0.000004	0.009866	0.02076	0.032904	0.044913
村均集体经济收 入	0.000004	0.012454	0.021666	0.023208	0.038505
发展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数量	0.006878	0.000007	0.01375	0.035615	0.065601
农业机械化水平	0.147771	0.000015	0.000015	0.001285	0.026254
高标准农田建设 面积	0.000006	0.010774	0.010774	0.032311	0.061027
省级美丽乡村中 心村数量	0.000004	0.015229	0.018613	0.02538	0.03553
国家级“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数 量	0.000004	0.012854	0.025704	0.038554	0.038554
省级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点 数量	0.000007	0.000007	0.035785	0.071563	0.071563
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年接待人次	0.000005	0.009197	0.018415	0.03182	0.049208
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	0.000012	0.000012	0.000012	0.118228	0.118228
“三品一标”产 品数量	0.000005	0.009551	0.015915	0.044552	0.054097
农用塑料薄膜使 用量	0.000004	0.011684	0.03154	0.035044	0.038548
畜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率	0.000004	0.01465	0.024375	0.036022	0.036022
化肥施用量	0.000003	0.016996	0.026061	0.030503	0.032259

农药使用量	0.000003	0.016913	0.025112	0.026906	0.031902
-------	----------	----------	----------	----------	----------

数据来源：根据模型结果整理

最终计算出，D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2018年至2022年的二级指标得分及综合评价得分，如表4-4。

表 4-4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各二级指标及综合评价得分

年份	经济提升	社会进步	文化繁荣	环境改善	综合得分
2018	0.000022	0.154659	0.000033	0.000014	0.154728
2019	0.049993	0.026025	0.031621	0.060243	0.167882
2020	0.111973	0.043152	0.095831	0.107088	0.358044
2021	0.149357	0.094591	0.304717	0.128475	0.67714
2022	0.219791	0.188412	0.33165	0.138731	0.878584

数据来源：根据模型结果整理

4.3.2 评价标准

借鉴李曙昊（2021）^[59]、王嘉玲（2024）^[60]等有关学者研究成果，结合本文研究需求，将D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测度标准进行划分，分为低质量水平、中低质量水平、中度质量水平、中高质量水平、高质量水平五种类型。见表4-5。

表 4-5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划分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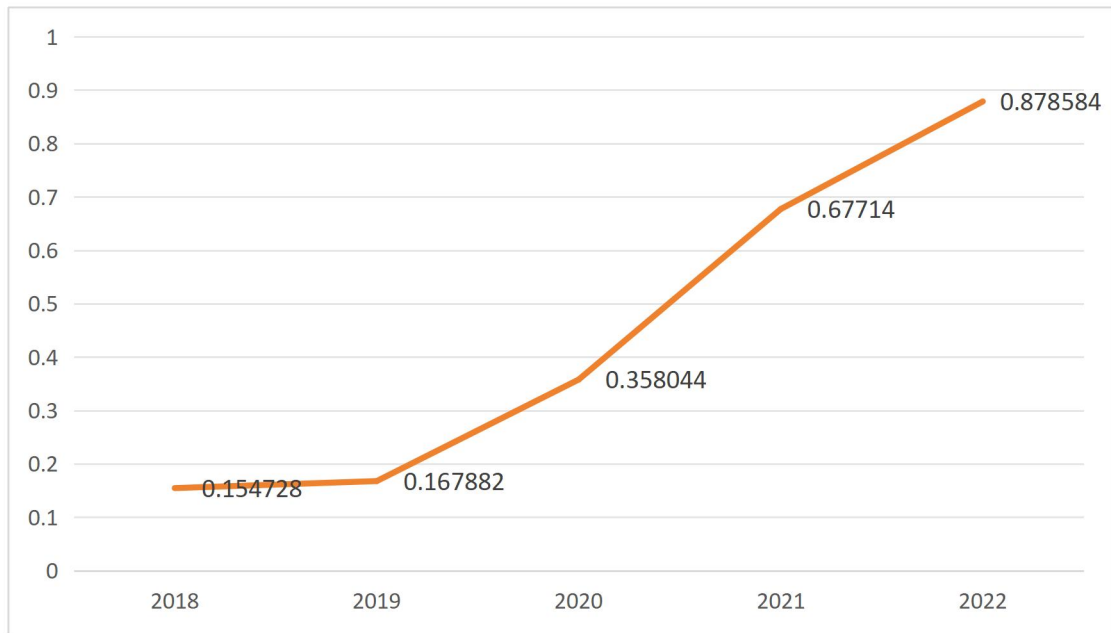
得分区间	水平划分
0.8~1	高质量水平
0.6~0.8	中高质量水平
0.4~0.6	中度质量水平
0.2~0.4	中低质量水平
0~0.2	低质量水平

4.4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测算结果分析

4.4.1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的整体评价

从D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综合得分情况进行分析（见图4-1）2022年D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综合得分为0.878584，2021年综合评价分为0.67714，同比增长29.75%；与2018年相比，增长了0.723856分，增长率为

467.82%；在研究期的 5 年期间，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总体是呈现上升的趋势的。



数据来源：根据模型结果整理

图 4-1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综合得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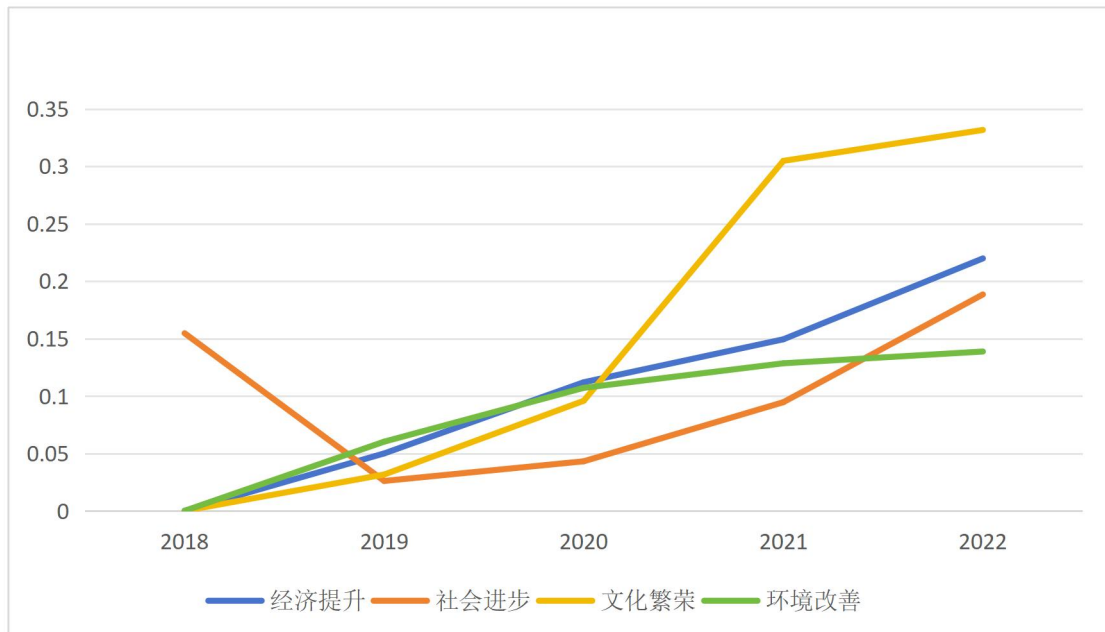
从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整体水平的阶段来看（见表 4-6），2018 年至 2022 年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阶段大致经历了由低质量水平、中低质量水平、中高质量水平到高质量水平的变化，整体呈现向好的趋势。2020 年是实现由低质量水平到中低质量水平变化的一个节点，2020-2022 年带动效应水平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并在 2021 年实现了迅速增长，由 2020 年中低质量水平直接增长为 2021 年的中高质量水平，最后在 2022 年达到了高质量水平。因此，按照一般发展规律，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有望持续增长。

表 4-6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阶段

年份	水平
2018	低质量水平
2019	低质量水平
2020	中低质量水平
2021	中高质量水平
2022	高质量水平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从各个维度层面对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综合得分进行分析（见表 4-4 和图 4-2），社会进步维度得分是有所波动的，2018 年至 2019 年出现了下降，但总体来看，是上升的趋势；经济提升、文化繁荣、环境改善的综合得分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的；其中文化繁荣维度得分，在 2021 年达到 0.304717 分，同比增长 217.97%，开始明显高于其他维度的，与此对应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也由 2020 年的中低质量水平跃升为 2021 年的中高质量水平，说明文化繁荣维度对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影响是较大的。



数据来源：根据模型结果整理

图 4-2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分维度综合得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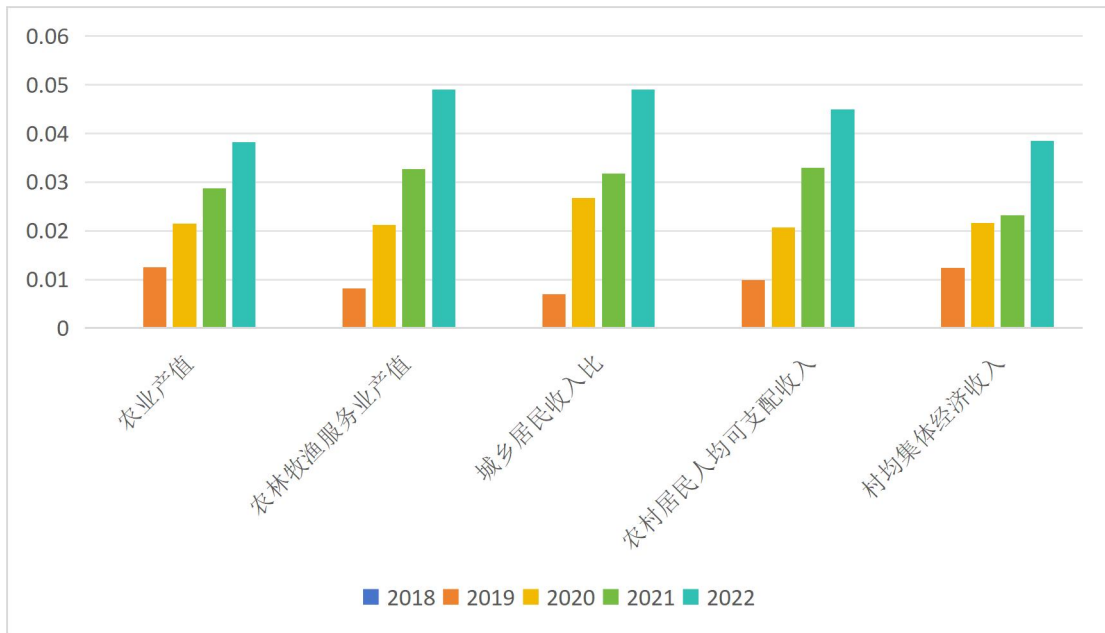
4.4.2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分指标评价

对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水平的具体分析以四个二级指标展开，分别讨论经济提升、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环境改善的评价得分情况。

（1）经济提升带动情况

从经济提升维度来看（见图 4-3），经济提升指标得分由 2018 年的 0.000022 分上升到了 2022 年的 0.219791 分。2019 年指标得分居于五个一级指标中的第二名。分析可以得知，在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得分方面，呈整体上升趋势，农业产值得分从 2018 年的 0.000004 分增长到 2022 年的 0.038263 分，农林牧渔业服务业产值得分从 2018 年的 0.000005 分增长到 2022 年的 0.049082 分，均实现逐步上升。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得分方面，城乡居民收入比得分从 2018 年的 0.000005

分增长到 2022 年的 0.049028 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分从 2018 年的 0.000004 分增长到 2022 年的 0.044913 分，均实现逐步上升。在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村均集体经济收入得分从 2018 年的 0.000004 分增长到 2022 年的 0.038505 分，实现逐步上升。这表明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在带动地方经济水平提升、农民增收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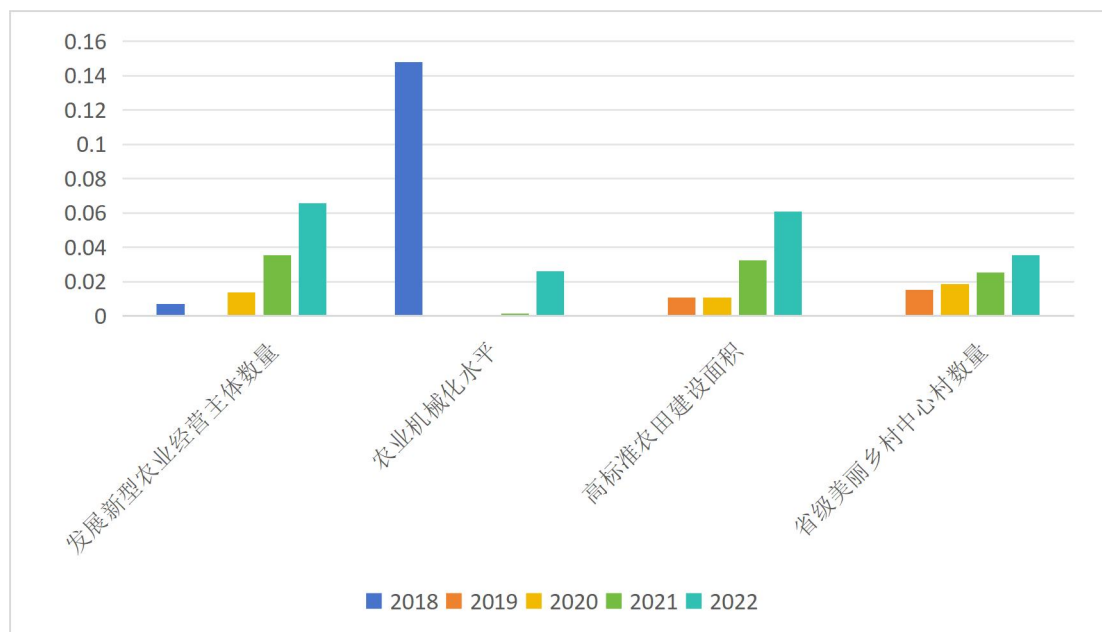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根据模型结果整理

图 4-3 2018—2022 年经济提升分项指标评价值的变化

（2）社会进步带动情况

从社会进步维度（见图 4-4）来看，社会进步指标得分由 2018 年的 0.154659 分上升到了 2022 年的 0.188412 分。2022 年指标得分居于五个一级指标中的第三名。分析可知，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指标得分在 2019 年出现了下降，而后呈现上升趋势，2018 年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56 个，2019 年仅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45 个，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力度不够。农业机械化水平指标由 2018 年的 0.147771 分到 2019 年的 0.000015 分，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而后实现增长，但是增长幅度并不大，这表明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的效果并不明显。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指标得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 2018 年、2019 年得分未发生变化，主要原因是受上级政策影响，当年度未开展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数量指标实现了稳步增长，由 2018 年的 0.000004 增长到 2022 年的 0.035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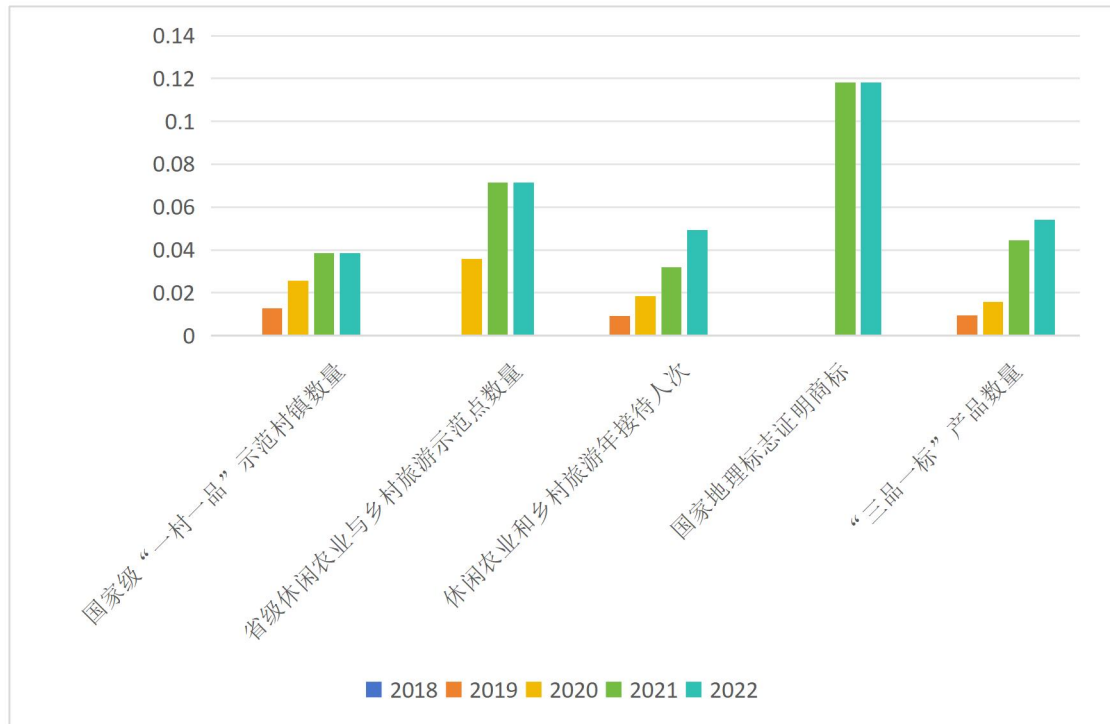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根据模型结果整理

图 4-4 2018—2022 年社会进步分项指标评价值的变化

(3) 文化繁荣带动情况

从文化繁荣维度（见图 4-5）来看，文化繁荣指标得分由 2018 年的 0.000033 分上涨到了 2022 年的 0.33165 分，是四个二级指标中最好的。这表明 D 县在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农文旅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地方农业产业品牌。具体来看，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数量指标得分由 2018 年的 0.000004 分增长为 2022 年的 0.038554 分，D 县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数由 2018 年的 2 个增长为 2022 年的 5 个，体现了 D 县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通过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发展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数量指标，由 2018 年的 0.000007 分增长为 2022 年的 0.071563 分，数量由 2018 年的 6 个增长为 2022 年的 8 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次指标由 2018 年的 0.000005 分增长为 2022 年的 0.049208 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数量指标由 2018 年的 0.000012 分增长为 2019 年的 0.118228 分。“三品一标”产品数量指标由 2018 年 0.000005 分增长为 0.054097 分。这表明 D 县具有“三品一标”生产资格的单位较之前有大幅度增长。



数据来源：根据模型结果整理

图 4-5 2018—2022 年文化繁荣分项指标评价值的变化

（4）环境改善带动情况

从环境改善维度（见图 4-6）来看，D 县环境改善指标得分在 2018—2022 年间实现了持续增长。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是环境改善子系统三个逆向指标，考虑到方便对比，本文已将该三个指标逆向化处理，所以在对比时不需考虑方向。通过图可知，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得分从 2018 年的 0.000004 分上升到 2022 年的 0.038548 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得分从 2018 年的 0.000004 分上升到 2022 年的 0.036022 分，化肥施用量得分从 2018 年的 0.000003 分上升到 2022 年的 0.032259 分，农药使用量得分从 2018 年的 0.000003 分上升到 2022 年的 0.031902 分，这三个指标和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的评价得分都有所增长。这反映 D 县在发挥乡村特色产业的绿色发展、环境改善带动效应上作出了较大努力，但也要注意得分的增长情况逐年放缓，体现了环境改善带动效应增长动力不强、不够持续。



数据来源：根据模型结果整理

图 4-6 2018—2022 年环境改善分项指标评价值的变化

第 5 章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影响因素分析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在近年来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对县域经济提升、社会进步、文化繁荣以及环境改善等方面均产生了显著的带动效应。通过对 2018 年-2022 年相关数据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洞察到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在不同维度带动效应的具体表现。在经济提升方面，农业产值、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稳步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比不断优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攀升；社会进步维度下，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逐步增加，农业机械化水平稳步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和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数量不断扩大；文化繁荣领域，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数量上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次增多，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三品一标”产品数量也有所增长；环境改善层面，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呈下降趋势，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不断提高。然而，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部分指标出现过停滞甚至在部分年份出现了下降，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充分发挥仍面临诸多因素的影响，以下将从多个关键方面展开深入分析。

5.1 产业扶持政策：制度供给与政策效能的双重制约

产业扶持政策在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发挥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其主要通过对资金、技术、土地等核心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形成中具有战略支点作用，其效能发挥呈现显著的双向分化特征。

一方面，精准制定与有效实施的产业扶持政策能够形成“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此效应可有力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显著提升就业密度，并极大地激发技术创新活力。以部分农业产业蓬勃发展的地区为例，政府出台的专项补贴政策成效斐然。通过专项补贴，企业在技术升级方面的成本大幅降低。就某大型农业企业而言，在政府专项补贴的支持下，该企业成功引进了先进的农业机械化设备，其机械化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 60% 迅速攀升至 80%。机械化水平的显著提高，不仅促使生产效率大幅跃升，单位时间内的农产品产量增加了 30%，而且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拓展以及生产环节的持续增多，就业容量也随之显著扩充。这一过

程中,政府的专项补贴就像一根强有力的杠杆,以相对较小的财政投入,成功撬动了企业大规模的技术升级和生产扩张,进而带动了就业增长和产业效益提升。从资金的流向来看,专项补贴精准注入企业的技术升级环节,使得企业有足够的资金购置先进设备,而设备的更新又引发了生产规模的连锁反应,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资金的精准投放和高效利用,充分体现了产业扶持政策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政策工具若出现错配,如“撒胡椒面”式的补贴方式,将会引发严重的负面后果。这种补贴方式会极大地稀释资金效能,使产业陷入“低效投入陷阱”。以D县为例,在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过程中,资金分配呈现出过度分散的态势。D县新型经营主体平均扶持资金仅为5万元/家,如此有限的资金投入,仅能勉强维持3—4个就业岗位。这也导致了D县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作进展缓慢,指标显示2018年D县发展了56个新型经营主体到2019年发展45个,出现了下降趋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皖南地区某县,当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投入达到10万元以上时,可创造8—10个岗位,就业密度差高达60%。同时,在投资杠杆方面,D县社会资本与财政资金投入比为1:1.2,远远低于全省1:2.5的平均水平。这充分表明D县政策引导效能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产业链投资缺口不断扩大。此外,在技术创新方面,D县设施农业机械化率长期停滞在58%

(2019—2021)。而邻县的实践经验表明,每提升1%的机械化率,可增加0.7%的农民收入。由于D县技术渗透滞后,不仅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还导致农民失去了大量潜在的增收机会,使得乡村特色产业的带动效应大打折扣。在“撒胡椒面”式的补贴方式下,资金被分散到众多经营主体,每个主体获得的资金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技术升级或业务拓展,无法形成有效的产业规模效应。从投资杠杆的角度看,较低的社会资本与财政资金投入比,意味着财政资金未能有效撬动社会资本进入产业,产业发展缺乏足够的资金动力。而技术创新的滞后,又进一步制约了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的提升,最终使得乡村特色产业带动就业、促进增收等方面的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5.2 产业融合：价值链延伸与业态创新的现实瓶颈

产业融合作为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的关键动力,通过纵向延伸产业链实现加工增值,横向拓展功能链进行业态创新,进而形成强大的“乘数效应”,

对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产生结构性影响。

一方面，全链条融合可提升就业密度。在产业融合成效显著的乡村地区，全链条融合展现出巨大优势。以粮食产业为例，每千吨稻米进入加工环节，不仅能实现产品的增值，还能创造 12 个就业岗位，有力地提升了就业密度。同时，文旅融合项目的成功打造，显著提升了产品或服务的客单价。例如，某乡村将传统的农耕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开发出“农耕文化体验游”项目。游客不仅可以参与农事活动，还能观赏民俗表演，品尝农家美食。与传统乡村旅游项目相比，该项目的旅游产品溢价率提升了 35%，游客接待量增长了 50%，极大地提高了乡村特色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粮食产业的全链条融合中，从田间种植到稻米加工，再到下游的食品制造等环节，每一个环节的拓展都伴随着新的就业岗位产生。而文旅融合项目则通过挖掘乡村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体验内容，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并且愿意为这种独特的体验支付更高的价格。从价值链的角度看，纵向的产业链延伸使得农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横向的文旅融合拓展了产业的功能边界，吸引了更多的消费群体，从而实现了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在经济收益和就业吸纳等方面的倍增。

另一方面，一旦出现融合断层，便会导致“增值漏损”现象。从纵向角度来看，D 县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2023 年全县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 65%，较长三角地区均值低 18 个百分点。这一差距直接导致流通环节就业密度下降。以稻米产业为例，D 县稻米加工多以初级产品为主，每吨稻米的增值空间相较于深加工产品少 3200 元。这不仅削弱了产业的盈利能力，还限制了产业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在横向协同方面，尽管 D 县拥有国家级旅游民宿 1 家、4A 景区 2 处，具备一定的文旅资源基础，但旅游收入仅占 GDP 的 4.3%，指标显示 D 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次虽实现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并不快，仅为年均增速 4.4% 低于 D 县 GDP 年均增速。原因在于，当地丰富的“诗歌文化”“李白足迹”等特色 IP 未能有效转化为体验式消费场景。与黄山等周边县市相比，D 县的“农业+文旅”融合度明显偏低，指标显示 D 县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数量在 2018 年到 2019 年以及 2021 年到 2022 年期间均出现停止增长。根据县文旅局抽样调查，D 县乡村旅游项目同质化率高达 67%，游客旅游体验不佳，综合收入受到严重影响。此外，在新型经营主体方面，具备三产融合能力的主体不足 15%。

许多“农家乐”仅仅停留在简单的餐饮服务层面，无法拓展多元化业态，导致全县年产值损失严重，特色产业的带动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在纵向融合断层的情况下，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意味着大量农产品未能充分挖掘其潜在价值，错失了在加工环节创造更多就业和提升产业收益的机会。而在横向协同方面，特色 IP 转化不足以及旅游项目同质化，使得 D 县的文旅资源未能有效整合利用，无法吸引更多游客和提升游客消费，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难以显现。新型经营主体三产融合能力不足，则进一步限制了产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乡村特色产业在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

5.3 人才资源：传导性衰减与技能弹性缺失

人才资源是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的核心驱动力，通过“知识—技能—管理”三级传导机制，深刻影响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释放强度。

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专业人才、复合型管理者构成“人力资本金字塔”。在人才结构合理的乡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凭借其旺盛的精力和较强的学习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保障生产效率；专业人才通过创新扩散，推动产业技术不断升级；复合型管理者则能够有效整合各类资源，提升产业运营效率。据相关研究表明，在这些地区，技能培训投入产出弹性可达 1.34，即每投入一万元培训经费，可新增 1.34 个就业岗位。例如，某乡村引入专业农业技术人才，对当地特色蔬菜种植进行技术指导，推广了无土栽培技术，使得蔬菜产量提高了 30%，同时新增了技术操作和维护岗位，带动了就业增长。在这个“人力资本金字塔”中，青壮年劳动力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力量，他们能够高效执行生产任务。专业人才则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他们带来的新技术、新理念能够推动产业向更高水平发展。复合型管理者站在顶端，负责统筹协调各类资源，确保产业的高效运营。技能培训投入产出弹性的数据充分表明，对人才培养的投入能够带来显著的就业增长和产业效益提升。以特色蔬菜种植引入无土栽培技术为例，专业人才的技术指导改变了传统种植方式，提高了产量，同时由于新的种植技术需要专门的操作和维护人员，从而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充分体现了人才资源在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中的核心驱动作用。

另一方面，老龄化与低学历现象突出会引发“技能锁定效应”。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D 县 60 岁以上劳动力占比高达 39.2%。以蔬菜种植为例，老年劳

动力由于体力和学习新技能的能力有限,导致 D 县蔬菜种植亩均用工成本较邻县高出 18%,产品价格竞争力被削弱,特色产业的市场份额受到挤压。在创新动能方面,D 县农产品电商渗透率仅为 12%,远低于全省 21%的均值,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 4.7%。人才素质的不足使得技术扩散速率降低,线上销售渠道难以有效拓展,特色农产品的市场范围受限,严重影响了产业的带动效应。在管理效能方面,73%的合作社存在财务不规范问题。这导致在向农商行申请融资时,成功率下降 41%,合作社规模扩张受阻,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制约了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发挥。老龄化严重使得劳动力在体力和学习能力上难以适应现代产业发展需求,增加了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竞争力。低学历现象导致人才在创新能力和对新销售渠道的开拓能力上不足,限制了产业的市场拓展。而合作社财务不规范等管理问题,则影响了产业的融资和规模扩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人才资源对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传导出现衰减,技能弹性缺失,无法有效推动产业发展和带动就业、增收等效应的实现。

5.4 产业特色：差异化竞争与同质化陷阱

特色资源是乡村特色产业发挥带动效应的独特优势,通过“地域专属性—文化排他性—市场溢价”路径,构成了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差异优势。

一方面,特色 IP 完整度与客单价紧密相关。查阅资料显示,每提升 10%文化元素利用率可增加 0.6 次游客重游率。例如,某古镇深度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将古建筑、传统民俗等文化元素融入旅游开发,打造出独特的古镇旅游 IP。游客在这里既能欣赏到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又能参与传统手工艺品制作,体验民俗节庆活动。古镇的游客重游率逐年上升,旅游收入大幅增长,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游客对这种独特文化体验的认可,使得他们愿意再次前来游玩,提高了游客重游率。而游客的频繁光顾又带动了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了整体的经济效益。从市场溢价的角度看,独特的文化体验让游客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从而实现了乡村特色产业的高附加值,进一步增强了特色产业的带动效应。

另一方面,同质化严重会导致“政策边际收益递减”。D 县发改委产业规划评估显示,全县 19 个历史文化村落中,仅有 5 个开发了文旅项目,诗歌文化元素利用率不足 30%。指标显示 D 县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数量年均增长 1

个,增长速度缓慢,同时 2021 年到 2022 年还出现了停滞。大量特色资源未得到有效转化,造成潜在年产值的巨大损失。在业态发展方面,73%的乡镇以“农家乐”为主导业态,且特色主题不足 20%。这种同质化的业态模式使得 D 县旅游客单价较皖南示范区低 42%,社会资本投入同比下降 15%。此外,在文化传承方面,D 县拥有 35 项非遗技艺,但仅有 7 项实现产业化,传承人平均年龄 61 岁,面临技艺失传风险。这不仅导致年就业容量减少,还使得乡村特色产业失去了重要的文化支撑。在 D 县,大量历史文化村落未充分开发,特色资源闲置,无法转化为经济收益。主导业态同质化使得市场竞争激烈,难以吸引游客和提升游客消费。非遗技艺产业化不足以及传承人老龄化问题,使得乡村特色产业的文化底蕴逐渐薄弱。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 D 县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无法充分利用特色资源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政策在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方面的效果逐渐减弱,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难以持续提升。

5.5 品牌建设: 认知断层与溢价流失

品牌建设对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具有重要的放大作用,通过“认知—情感—行为”链条,提升乡村特色产业的市場影响力和经济效益。

一方面,区域公用品牌发挥着重要作用。使用区域公用品牌的企业利润率较未使用企业更高,品牌强度指数每提升 1 单位,可带动流通环节就业增长 2.3%。例如,某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统一产品标准和质量监管,提升了产品整体形象和市场认可度。该地区特色农产品价格较同类产品高出 20%~30%,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带动了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就业增长。在这个地区的实践中,区域公用品牌的打造首先从认知层面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让消费者更容易识别和记忆。通过统一标准和质量监管,在情感层面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和好感。而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最终转化为购买行为,使得产品价格提升、市场份额扩大。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农产品加工、销售等流通环节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带动了就业增长,充分体现了品牌建设对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放大作用。

另一方面,品牌化率低会导致市场半径缩减,对传统渠道的依赖限制了溢价空间。指标显示 D 县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数量在 2018 年—2020 年出现停滞,“三品一标”产品数量增长也较为缓慢。在认知层面,“D 县制造”知晓度仅为 23%,与长三角地区区域公用品牌知晓度 37%的均值相比差距较大,导致大量潜

在消费者流失，特色农产品市场拓展困难。在情感联结方面，D 县文旅项目复购率仅为 18%，远低于文化体验型景区平均 35%的水平。客户生命周期价值降低，造成年收入损失，影响了乡村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渠道方面，D 县 70%的特色产品依赖传统批发渠道，而传统批发渠道溢价空间较电商渠道低 42%。同时，电商渠道占比不足 12%，电商页面跳出率高达 67%，远高于行业均值 40%，线上转化效率低下。这些问题使得 D 县特色产业品牌价值难以提升，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无法充分发挥。D 县较低的品牌知晓度使得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吸引到更多的潜在消费者。文旅项目复购率低反映出消费者对其情感认同不足，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客户群体。对传统批发渠道的过度依赖以及电商渠道发展的滞后，限制了产品的溢价空间和销售范围。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 D 县在品牌建设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无法通过品牌建设提升产业的市场影响力和经济效益，进而制约了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充分发挥。

第 6 章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政府干预策略

6.1 政策工具优化：建立精准化政策效能提升机制

在提升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进程中，政策工具的优化意义重大。优化产业扶持政策的核心在于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与政策杠杆作用的高度协同。这需要政府通过动态调整政策工具组合，全力破解“低效投入陷阱”，达成“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就业创新”传导效率的最大化。

一方面，应积极实施“分层分类”资金配置机制。在资金分配上，设立差异化补贴门槛，针对新型经营主体，将扶持资金科学地梯度划分为基础补贴（5 万/家）与规模奖励（10 万/家以上），这种分层方式能够根据经营主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规模给予相应的支持。对于达到特定加工产能标准的主体，额外追加产业链协同补贴。参考皖南地区成功经验，规模以上产业补贴投入能大幅提升就业密度。例如，皖南某县对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给予高额补贴后，这些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比补贴前增长了 40%。政府还需引入“政策效能评估模型”，基于就业乘数、投资杠杆系数等关键指标，建立年度政策动态调整机制。以社会资本与财政资金投入比为例，若当前比值较低，远低于目标值，政府可针对产业链关键环节（如冷链物流、精深加工），实施税收返还与贴息贷款组合政策。税收返还能够直接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贴息贷款则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不仅能减轻企业资金压力，还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当企业有更多资金投入生产运营中，产业规模得以扩张，就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要大力强化技术渗透专项政策。设立“智能化农机购置专项基金”，该基金优先补贴无人机飞防、智能分拣设备等设施农业机械化的短板领域，以此提升设施农业机械化率。以 D 县为例，目前其设施农业机械化率仅为 58%，低于周边先进地区，通过该专项基金补贴，能够快速填补机械化短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建立“技术适配性评价体系”，针对 D 县蟹苗育种、非遗技艺传承等特色领域，政府应积极联合上海海洋大学等科研机构，共同开发本土化技术解决方案。在蟹苗育种方面，科研机构能够运用先进的生物技术，为 D 县培育出更

优质、抗病能力更强的蟹苗品种，提升蟹苗的成活率和品质，进而提高河蟹产业的整体效益。在非遗技艺传承方面，与高校合作可以对传统技艺进行创新改良，使其更适应现代市场需求。通过产学研深度合作，降低技术引进成本，提高技术与本地产业的适配度，推动特色产业技术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增强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

6.2 三产融合深化：构建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体系

产业融合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在提升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进程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实现这一效应的核心，在于纵向增值链的深度延伸与横向功能链的多元拓展这两个关键维度协同发力。只有如此，才能充分释放产业融合的巨大潜能，切实增强乡村特色产业在带动就业、促进增收、推动乡村发展等方面的显著成效，重点是要解决“加工断层”与“业态浅表化”问题。

一方面，应着力打造“三链融合”示范工程。在纵向延伸方面，以河蟹产业为重点，积极推广“蟹苗育种—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全链条模式。通过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在各个环节加大投入，提升产业附加值。目前，D县河蟹产业多集中在养殖环节，精深加工和冷链物流发展相对滞后。通过政策鼓励企业投资建设精深加工生产线，将河蟹加工成蟹黄酱、蟹肉罐头等产品，能够使河蟹的附加值提升3-5倍。在横向拓展方面，要充分挖掘D县“诗歌文化”资源，开发“诗歌文化+农旅体验”融合项目。将李白文化园、桃花村民宿集群串联为文化体验动线，资料显示，每提升10%文化元素利用率可增加0.6次游客重游率，实现客单价提升。政府部门应通过整合文旅资源，打造特色旅游线路，例如推出“李白诗歌探寻一日游”线路，游客沿着线路可以参观李白相关的古迹，参与诗歌朗诵活动，在民宿品尝特色农家菜。这样的线路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要建立“主体能力跃升计划”。对具备三产融合潜力的经营主体，实施“能力认证制度”，通过认证的主体可享受用地指标倾斜与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数据显示，此类主体单位面积产值可达传统主体3.2倍。例如，某经过能力认证的经营主体，在获得用地指标倾斜后，扩大了经营规模，引入了新的业态，其单位面积产值从原来的每平方米5000元提升至16000元。政府还应大力推广“村企联建”模式，借鉴七房村“蟹逅七房”共富工坊经验，通过村集体闲置资

产入股、企业技术管理输出，实现农户“零门槛”就业与产业链嵌入，人均增收得到显著提升。在七房村的案例中，通过村企联建，农户利用自家闲置房屋参与民宿经营，人均年收入增加了 20000 元。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协调与监管作用，保障村企双方权益，推动乡村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增强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

6.3 人力资本重构：构建“金字塔式”人才支撑体系

在全力提升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征程中，人力资本所释放出的“知识溢出”与“技能乘数”效应，犹如强劲引擎，对乡村特色产业带动增收、就业以及推动乡村发展等多方面效能提升起着关键作用。而政府作为乡村发展蓝图的绘制者与推进过程的掌舵人，深刻洞悉实现这两大关键效应的核心要义，就在于精准施策，全力优化乡村劳动力年龄结构，有序开展能力分层培养工作，确保“知识—技能—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发挥”这一关键传导路径始终保持高效畅通。

一方面，应实施“青苗回流工程”。为吸引返乡创业的青壮年劳动力，政府提供“技能补贴+创业贷款”组合激励，以此提升大专以上学历从业者比例。同时，要建立“银龄专家智库”，聘用 61 岁以上非遗传承人作为技术顾问，通过“师徒制”培养年轻技工，破解技艺失传风险，提升非遗产业化率。例如，某非遗项目在引入“银龄专家”后，通过“师徒制”培养了 10 名年轻技工，该非遗项目的产品产量提升了 30%，产业化率从原来的 30%提升至 50%。政府通过搭建平台，促进新老人才交流，为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发挥注入新活力。

另一方面，要推行“管理赋能行动”。针对合作社财务人员，政府应实施“持证上岗”制度，并联合农商行开发“规范化财务管理系统”，提升融资成功率。数据显示，规范财务可降低融资成本 18%。在 D 县，许多合作社由于财务不规范，在向农商行申请融资时面临诸多困难。通过实施“持证上岗”制度，能够确保财务人员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使用规范化财务管理系统则能使财务流程更加清晰、规范。政府还应开发“理论+实操+跟踪”三维课程体系，开设短视频营销（抖音流量算法解析）、智慧农业（物联网设备操作）、财务风控（合作社账务规范）等实战课程，实行“学分银行”认证制度，累计 80 学分可获得创业贷款优先权。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人才的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得到提升，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增强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

6.4 产业特色升级：塑造不可复制的竞争优势

在提升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整体布局中，需要构建起别具一格的差异化竞争壁垒。这一举措对于深度挖掘乡村特色产业潜力，扩大市场影响力，进而有力带动就业、促进增收以及推动乡村全面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政府作为乡村发展的主导力量，深刻认识到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核心就在于全力促成“资源禀赋→文化符号→市场溢价”这一价值转化闭环的高效达成。

一方面，应实施“特色 IP 培育计划”。对 D 县历史文化村落进行“主题化改造”，如提升诗歌文化元素利用率，打造“李白诗路”“诗歌小镇”“诗词擂台赛”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利用数字技术，开发“千年圩田元宇宙”，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复原古圩田生态系统，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圩田文化研学基地”，配套数字藏品发行、虚拟农事体验等创新业态。在非遗传承方面，实施“非遗活化工程”，与高校合作成立“非遗创新实验室”，对传统鱼灯进行模块化设计改造，开发可 DIY 的“亲子鱼灯套装”，通过小红书、得物等平台进行精准营销。同时，打造“非遗传承人 IP 矩阵”，选拔 20 名非遗传承人进行新媒体运营培训，打造“篾匠老张的竹编世界”“绣娘阿珍的二十四节气”等个人 IP 账号。此外，还可以开展“乡村美学革命”，聘请中国美院团队对 10 个重点村进行整体设计，保留皖南建筑肌理的同时植入现代艺术元素，例如建设“稻田美术馆”，利用彩色水稻种植打造大地艺术景观，吸引摄影爱好者与研学团队。通过这些举措，D 县能够挖掘与创新特色文化资源，提升乡村产业特色与吸引力，增强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

另一方面，要推行“同质化项目退出机制”。建立“特色产业负面清单”，明确禁止在 5 公里半径内重复建设同类型项目，对同质化“农家乐”实施“特色认证”动态管理，未通过认证者限期转型或退出。目前，D 县 73% 的乡镇以“农家乐”为主导业态，且特色主题不足 20%，同质化竞争严重。通过实施这一机制，能够规范产业发展秩序，避免过度竞争导致的资源浪费。例如，某乡镇在实施同质化项目退出机制后，引导部分“农家乐”转型为乡村民宿、农事体验园等特色项目，该乡镇的旅游收入在半年内增长了 25%。政府通过规范产业发展秩序，避免同质化竞争，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差异化发展，提升乡村特色产业整体竞争力，增强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

6.5 品牌价值重塑：构建三级品牌传导体系

在提升 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系统工程中，品牌价值所蕴含的“认知—情感—行为”转化机制发挥着重要的放大作用，能够显著增强乡村特色产业在推动乡村发展等方面的效能。政府作为乡村发展的关键引领者与推动者，深知实现这一转化的核心要义在于牢牢把握公共品牌引领与渠道协同这两大关键抓手，以此充分释放乡村特色产业的市场溢价空间，全方位提升产业带动效应。

一方面，应进行品牌矩阵构建。制定《区域品牌使用规范》，明确公共品牌授权标准，建立“质量追溯码+防伪标识+包装视觉规范”三位一体管理体系，对合规使用企业给予销售额 1%~3% 的奖励。开展“品牌价值提升行动”，委托专业机构每年发布《D 县农产品品牌价值榜》，对进入榜单的企业给予 10-50 万元的资金奖励。在数字传播方面，打造“乡村直播间矩阵”，在重点村镇建设标准化直播间，配置虚拟背景、多机位切换等专业设备，开展“镇长带货”“非遗传承人秀技”等主题直播。实施“内容种草计划”，与知乎、马蜂窝合作创作《D 县十二时辰》《寻味诗路》等深度内容，运用 VR 技术制作沉浸式文旅宣传片，在高铁站、机场进行循环展播。通过这些措施，能够强化品牌建设与管理，提升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增强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

另一方面，要建立“情感联结强化机制”。开发“重游积分系统”，对复购游客提供文化体验项目 8-9 折优惠，提升文旅项目复购率。目前，D 县文旅项目复购率仅为 18%，远低于文化体验型景区平均 35% 的水平。通过重游积分系统，能够鼓励游客再次前来游玩，增加游客黏性。实施渠道重构计划，建立“长三角城市体验店”，在上海陆家嘴、杭州西湖等核心商圈设立品牌旗舰店，采用“场景化陈列+文化体验+即时配送”模式，提供现磨胚芽米、即食小龙虾等高端产品。发展“会员制农庄”，面向长三角高净值人群推出“诗意田园”会员计划，提供私家菜园托管、节令农产品直供、乡村会客厅使用权等权益。通过优化消费体验，拓展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忠诚度，增强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

第 7 章 研究结论及未来展望

7.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 D 县乡村特色产业的基础条件与发展现状,结合动态评价模型对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进行量化测度,形成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通过产业基础与发展成效分析,D 县依托优越的地理区位禀赋与扎实的经济基础,已构建涵盖粮油、水产、果蔬、畜禽四大传统产业,以及农文旅融合、农产品加工两大新兴产业的“4+2”特色产业体系。产业发展呈现多维突破:一是集体经济创新提质,通过资源整合与产权改革实现增值收益;二是产业集群效应凸显,形成上下游联动的产业链生态;三是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发展,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带动能力显著提升;四是三产融合纵深推进,以“农业+文旅”“生产+加工”模式激活乡村经济新动能。

第二,通过带动效应测度与差异性特征分析,基于构建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四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 2018—2022 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一方面呈现时序演变特征,D 县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综合指数从 0.154728(低质量水平)提升至 0.878584(高质量水平),年均增长率达 53.45%,呈现“阶梯式跃升”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呈现维度差异特征,各子系统带动效应呈现显著非均衡性,文化繁荣指数居首,印证特色产业对乡土文化传承与文旅品牌塑造的催化作用,经济提升指数与社会进步指数次之,反映产业增收与就业吸纳效应,环境改善指数相对滞后,提示生态化转型需强化政策干预。

第三,通过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产业扶持政策方面,存在制度供给与政策效能的双重制约;二是产业融合方面,存在价值链延伸与业态创新的现实瓶颈;三是人才资源方面,存在传导性衰减与技能弹性缺失;四是产业特色方面,存在差异化竞争与同质化陷阱;五是品牌建设方面,存在认知断层与溢价流失。针对上述的问题,本文为 D 县政府提升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提供可行的建议:一是政策工具要优化,建立精准化政策效能提升机制;二是三产融合要深化,构建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体系;三是人力资本要重构,构建“金

“金字塔式”人才支撑体系；四是产业特色要升级，塑造不可复制的竞争优势；五是品牌价值要重塑，构建三级品牌传导体系。

7.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基于对大量文献的研读，紧密结合 D 县实际状况，以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通过实地调研与评价体系展开深入分析，进而归纳得出一系列结论与建议。然而，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客观因素方面，资料收集尚不够完善。在调研过程中，数据时效性存在局限，未能获取反映最新发展态势的年度数据。资料收集的范围极为有限，收集渠道相对狭窄，调查地域也受到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全貌进行全面且精准的剖析。同时，本研究仅选取 D 县这单一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致使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从自身主观因素来看，由于笔者写作水平与专业能力存在欠缺，对乡村特色产业带动效应的评价研究论述存在不全面、不深入的问题，诸多关键内容未能涉及。因此，在未来的学习与工作中，笔者将持续加强理论学习，积极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全力提升自身能力，拓宽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以期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更为丰硕、精准的成果。

参考文献

- [1] 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2]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3] 西奥多·W·舒尔茨著.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4] Poter M.Compet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M].US:FreePress,1990.
- [5] 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 [6] KOJIMA K.The“flying geese”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theoretical extensions,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0,11(4):375-401.
- [7] GABE T. Loc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new business Activity[J].Growth and Change,2003,34 (1):17-39.
- [8] Osterud Grey.Farm crisi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outh-central New York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J].Agricultural history,2010,84(2):141-165.
- [9] Alan de Brauw.The Feminisa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3,49(5):689-704.
- [10] Halonen M,Kotilainen J,Tykkylainen M,Vatanen E.Industry Life Cycles of a Resource Town in Finland—the Case of LIEKSA[J].European Countryside,2015,1(7):16-41.
- [11] GarcíaLlorente,Marina,Rossignoli,et al.Sustainability,Vol.8,Pages 1238:Social Farming in the Promotion of Social-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 Rural and Periurban Areas.2016.8(12).
- [12] 西奥多·W·舒尔茨著.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13] Greene M J.Agriculture diversification initiatives:State government rol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J].Rural Economic Altematives,1988:85-86.
- [14] 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 [15] Sugirtu R.Ernawwati D,Birtles A.The Potential for Developing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Rural in Surakarta,Indonesia:A Case Study[J].ASEAN Journal on

- Hospitality&Tourism,2003,22(2):78-90.
- [16] 罗纳德·J.奥克森.治理地方公共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27.
- [17] Scott. Region-specific budgeting of rural development funds—An application study[J]. Land Use Policy,2011(77):126-134.
- [18] Harald Pechlaner,Marcus Herntrei,Sabine Pichler.From destination management towards governanc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the case of South Tyrol,Italy[J].Tourism Reviewi,2012(67):22-33.
- [19] 杨志良,姜安印.小农户与乡村特色产业的包容性衔接及其路径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1,20(02):249-255.
- [20] 万俊毅.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2,No.76(06):19-22.
- [21] 许伟.乡村特色产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05):38-52.
- [22] 赵若舒.数字赋能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J].当代农村财经,2023(10):44-48.
- [23] 杨永.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策略研究——以地理标志为视角[J].菏泽学院学报,2018,40(06):48-51.
- [24] 武青青.发展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J].中国商论,2019,(14):214-216.
- [25] 王超群.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文化产业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01):105-108.
- [26] 李凤艳.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助力辽宁乡村全面振兴——以北票市马友营蒙古族乡小勿兰村为例[J].农业经济,2021,(08):57-58.
- [27] 习楚琼.扎实推进农业产业发展打造乡村“特色产业”[J].农业工程技术,2022,42(12):101-102.
- [28] 陈四辉.政府作用,地方特色产业培养与农村经济发展——浏阳花炮产业发展带来的思考[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22):4.
- [29] 侯志阳.乡镇政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策略与逻辑——基于对泉州市 H 乡运作过程的观察[J].学术研究,2021(3):6.
- [30] 李在力,张箫.探究乡镇政府行为对茶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建议——以安

- 溪县龙涓乡为例[J].现代商业,2018(23):2.
- [31] 何永珍.发展富民乡村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J].公共行政,2019(03):38-40.
- [32] 韩喜平,王公博."积极的惯性":基层政府扶持农业产业发展的行为逻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1):8.
- [33] 裴新伟.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的审思[J].公共行政(02),2018:66.
- [34] 常冬海.汇聚乡村振兴的人才力量[J].党的生活(江苏),2018,000(006):60-61.
- [35] 袁金选.关于泾川县农村产业发展对策的几点思考[J].农家科技:中旬刊,2019(6):1.
- [36] 王坤."互联网+"时代我国农村电商产业集群发展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2021(8):3.
- [37] 高鹏.农村地区特色产业经济发展现状与改善对策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22(1):9.
- [38] 李卓,郑永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产业振兴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基于 A 县产业扶贫实践的考察[J].云南社会科学,2022(1):7.
- [39] 马玉波.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带动效应研究[D].东北农业大学,2012.
- [40] 张慧静.主题乐园带动地方产业发展效应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6.
- [41] 刘阳.澳门会展业发展水平的测度与产业带动效应研究[D].暨南大学,2018.
- [42] 沈至忱.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研究[D].云南大学,2022.
- [43] 马如霞.河北省农业科技园区的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带动效应研究[D].河北大学,2024.
- [44] 代合治.山东省乡村产业结构变化及基地布局[J].地域研究与开发,1997(02):53-57.
- [45] 卞广萌,程文.大城市边缘区乡村产业空间的多维优化研究[J].农业经济,2017(06):19-20.
- [46] 邱俊杰,BENFIDA Rui,余劲.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内涵特征、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6):1-14.
- [47] 姚君慧.乡村振兴背景下荣成市特色产业发展调研及策略研究[D].山东理工大学,2023.

- [48] 周丽娟,李佳雯.特色产业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芷江侗族自治县古冲村为例[J].现代农业科技,2023,(23):202-204+209.
- [49] 贾宁.数字经济下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3(23):87-89.
- [50] 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2021年全国乡村产业发展报告[M].第1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2.
- [51] 杨亚东,罗其友,伦闰琪,张晴,程长林.乡村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动力机制研究——基于系统分析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20,No.492(12):61-73.
- [52] 肖卫东.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径[J].理论刊,2023(01):117-126.
- [53] 郭雨柔.黑龙江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支持政策研究[D].哈尔滨商业大学,2023.
- [54] Duesenberry, J.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55] [英]彼得·拉斯莱特.洛克.政府论[M].三联书店,2007:78-79.
- [56] 颜双波.基于熵值法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评价[J].统计与决策,2017(21):142-145.
- [57] 于超,左文琦,郑丹.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4(03):43-47.
- [58] 梁俊芬,蔡勋,刘序,周灿芳.广东省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23):81-91.
- [59] 李曙昊.宁夏乡村产业兴旺评价研究[D].宁夏大学,2023.
- [60] 王嘉玲.巴彦淖尔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评价研究[D].吉林大学,2024.

致 谢

此刻，凌晨三点的台灯依然亮着，屏幕的光晕映在窗玻璃上，与远处零星的路灯遥相呼应。我轻轻合上电脑，望向熟睡中妻女的方向，女儿均匀的呼吸声从卧室传来，像一缕柔软的风，将三年来的疲惫与坚持揉进眼底的温热。这一路，是基层工作的千头万绪，是论文写作的辗转反侧，是初为人父的手忙脚乱，更是无数双手托举着我，在生活的褶皱中找到光亮的轨迹。

首先，谨以最深的敬意，感谢我的导师汪茂泰教授。您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谦和的为人，让我在学术的海洋中始终心怀敬畏。每一次深夜收到您逐字逐句的批注，每一次迷茫时您那句“基层工作就是最好的论文素材”的鼓励，都让我明白：学术不仅是知识的沉淀，更是与实践对话的桥梁。您不仅是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更是教会我如何用公共管理的视角去倾听民生、服务百姓的人生导师。

感谢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作为基层公务员，乡村振兴、防汛抗旱、基层治理的战场从未停歇，而你们用包容与信任为我撑起一片求学的天空。忘不了在忙碌中，领导主动调整值班安排让我能兼顾论文调研，同事们帮我整理档案数据笑着说“你这论文要是能帮咱乡镇多争取点政策，也算大家的功劳”。那些在田间丈量的脚步、在农户家中记录的对话、在深夜办公室敲下的案例，早已模糊了工作与学术的界限，只留下“为民”二字沉甸甸的分量。

最难以言说的亏欠与感激，留给我的家人。妻子，你总说我“白天是基层战斗员，晚上变书生”，却默默揽下照顾女儿的重担。记得女儿高烧那晚，我正为论文答辩焦头烂额，你抱着孩子整夜未眠，清晨却只轻描淡写地说：“你去忙吧，我请假了。”还有我年迈的父母，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却为了支持我的学业，一次次从老家赶来，用佝偻的背脊为我托起一片安稳。而我最亲爱的女儿，你降临人世的啼哭与论文开题几乎同期开始。一年来，我常在书桌前听着你梦中的呢喃，看着你从襁褓中的婴儿跌跌撞撞学会走路。你抓着我论文草稿撕咬的牙印、印在扉页上的小小掌纹，都是这段岁月最珍贵的注脚——爸爸或许错过了许多你成长的瞬间，但未来，我会用更好的自己，为你筑一座看得见星空的屋檐。

还要感谢那些素未谋面却慷慨相助的陌生人：调研途中为我指路的村民大爷，

在田间地头倾诉衷肠的大婶，暴雨中坚持带我走访的村书记……你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教会我：公共管理不是冰冷的文字堆砌，而是要让每一个普通人的叹息都被听见，让每一份微小的期待都有回响。

最后，想对二十八岁的自己说：谢谢你没有在会议记录与奶粉账单的夹缝中放弃，谢谢你在女儿的哭闹与文献的晦涩间依然选择笨拙地坚持。这篇论文或许不足以改变什么，但它见证了一个基层青年如何用学术的烛火照亮实践的沟壑，又如何从烟火人间的褶皱里，打捞起理想最初的模样。

天边已泛起鱼肚白，女儿在梦中咿呀了一声。我轻轻关上台灯，晨光正一寸寸漫过书桌。忽然想起导师曾说：“公共管理的意义，不在于制定完美的政策，而在于让制度长出人性的温度。”此刻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确信：脚下这条平凡的路，纵然布满荆棘，却因爱与责任，始终通向光明。